

彩虹力量覺醒——同志解放運動第一人

#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傳

拉夫·杜斯——著  
陳品秀——譯



*Magnus Hirschfeld*

The Origins of the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在金賽之前就屬馬格努斯·赫希費爾德。他在納粹德國時期被妖魔化。他是猶太人、同志，還是個左派分子。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故事，他對於性學研究、性方面的法律改革、女性主義以及解放LGBT（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者、跨性別者）的先導貢獻具有十足的啟發性！」

——人權與LGBT鬥士 彼得·塔切爾（PETER TATCHELL）

「現代同志權利運動的先驅……杜斯簡短易讀的傳記，將這位領袖級人物的生平和時代呈現給了二十一世紀的讀者。」

——大衛·費恩巴赫（DAVID FERNBACH，《這條螺旋路：同志對人類生存的貢獻》（*The Spiral Path: A Gay Contribution to Human Survival*）作者）

「有關赫希費爾德生平和工作成果，杜斯的傳記不但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也填補英文研究的遺缺。客觀且簡潔，可為LGBT的歷史記上一筆。」

——詹姆斯·斯特克利（JAMES STEAKLEY，《德國的同志解放運動》（*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作者）

「馬格努斯·赫希費爾德是一位被歷史遺忘的巨人，他許是第一個同志運動的發起者，就在上一個世紀……拉夫·杜斯的傳記還給了赫希費爾德和他所帶領的運動一個歷史公道。所有的人應該知道這段歷史。」

——約翰·代米利奧（JOHN D'EMILIO，《房內事：美國同性戀史》（*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共同作者）

「細膩且廣泛，是介紹馬格努斯·赫希費爾德，這位二十世紀初德國『性學界的愛因斯坦』的生平及其工作成果的一本好書。杜斯簡潔的敘述既動人又緊湊，從變性權、壯陽藥、避孕到有關性傾向和慾望的新理論皆鉅細靡遺地緊扣讀者的心。」

——達格瑪·赫爾佐格（DAGMAR HERZOG，《歐洲的同性戀：二十世紀歷史》（*Sexuality in Europe: A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作者）



時報悅讀網

ISBN 978-957-13-6131-4 (544.75)  
BDF0050 NT\$230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1868-1935）是同志解放運動中偉大的先驅者之一。赫希菲爾德留給後人的遺產不僅深受同志標竿人物如克里斯多夫·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和馬太辛協會（Mattachine Society）創辦人哈利·海伊（Harry Hay）的推崇，並且引起了整個二十世紀和全世界的共鳴。赫希菲爾德奉他的座右銘「科學是通往公平之路」為主旨，共同創設了一個旨在維護同志權利和架構性平等的科學框架的德國「科學人道委員會」。他也是維護婦權的先導者，早在二十世紀初就極力爭取墮胎除罪化以及女性教師與女性公務人員結婚生子的權利。一九三三年，赫希菲爾德因參與性解放運動而成為納粹的箭靶，他們不僅掠奪了他的性學研究所，還公開燒毀他的書籍。

本傳記追隨赫希菲爾德，從他在普魯士波美拉尼亞省的出生，歷經威瑪共和以及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直到他事業的高峰期，並在一片喝采聲中同志運動首發於德國。作者拉夫·杜斯（Ralf Dose）闡明了赫希菲爾德在同志解放運動中所扮演的開創性角色，並釋疑了他的一些主要理論性的主張與概念，這些概念至今仍深刻影響著我們對於人類的性和關於社會公平的理解。



#### 作者簡介

### 拉夫·杜斯 Ralf Dose

柏林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協會的共同創立者兼主管。他的寫作範圍廣泛，舉凡性教育、同性戀、同志權利運動和性研究史皆是，他曾經在柏林自由大學和漢諾威大學任教。

#### 譯者簡介

### 陳品秀

台大哲學系畢業，先後在美國新墨西哥州州立大學和亞歷桑納大學藝術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主要關注為視覺藝術和大眾文化。現為英文老師，並從事翻譯。譯有《山本耀司：My Dear Bomb》、《生態設計經典1000》、《幹嘛要有小孩？》等多部作品。



打造個人生活風格，挖掘生活精彩事件！

歡迎加入「新潮線」粉絲專頁

[www.facebook.com/tidenova](http://www.facebook.com/tidenov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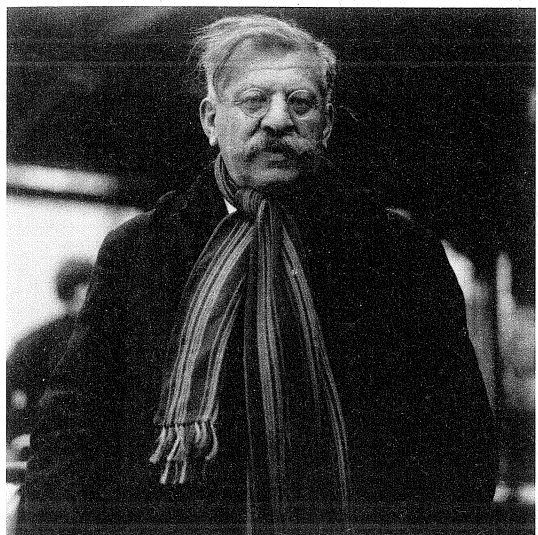


彩虹力量覺醒——同志解放運動第一人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傳

拉夫·杜斯——著 陳品秀——譯

*Magnus Hirschfeld*

The Origins of the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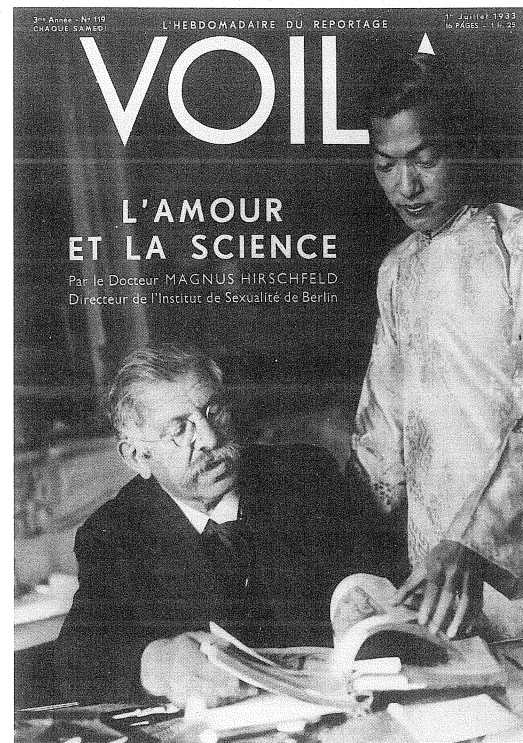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1930 (Archives of the Magnus-Hirschfeld-Gesellschaft e.V., Berlin)

# Magnus Hirschfeld

The Origins of the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RALF DOSE



赫希菲爾德與李兆通，巴黎，1933。法國《Voilà》畫刊第119期封面。（Archives of the Magnus-Hirschfeld-Gesellschaft e.V., Berlin）

## 目錄

推薦文

時代先驅者

黃國堯

看見多元樣貌的每一分子

楊平靖

英文版引言

1

德文版引言

3

第一章 赫希菲爾德的生平記事與同志運動起源

來自猶大家庭

2

大學教育——捨棄最愛，改念醫學

3

在馬德堡的首次執業：自然療法的實踐

3

赫希菲爾德的私人生活與交往

4

經濟生活靠行醫和大量出版的收入

4

猶太教、猶太復國主義與反猶太主義

5

0

與社會民主黨的關係	5
深受文學的薰陶	6
所提倡的運動與科學研究組織	6
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	6
科學期刊與協會	7
性改革世界聯盟	7
性學研究所	7
赫希菲爾德的晚年	8
世界巡迴演講	8
流亡與過世	9

### 第二章

#### 赫希菲爾德的性學與優生學研究

「性的中間性」學說	1
性器官的「性的中間性」	1
其他身體特徵的「性的中間性」	1

性慾的「性的中間性」	1
其他心理特徵的「性的中間性」	1
提出「適應治療」療程的概念	1
優生教育	1

### 第三章

#### 對同志運動的啟發與留下的資產

他的學生卡爾·吉斯和李兆通	1
流亡者：侯丹、夏皮柔、希勒、懷爾	1
德國境內的復興運動	1
在北美洲的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	1

### 後記 註解

1	1
4	3
8	4



推薦文

## 時代先驅者

黃國堯（同光同志長老教會駐堂牧師）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一八六八年五月十四日～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四日）這位活於德國納粹期間的猶太人，能夠勇於面對自己的性傾向，在當時社會仍然對同性戀不太了解的階段，他卻甘冒大不韙地公開自己是同志的身分，並且極力爭取同志應有的平權，實在勇氣可嘉！雖則他當時把同性戀視為第三性，與我們今天對此名稱的解釋有所不同（今人把第三性看作類同跨性者「Transgender」，亦有跨性者不太喜歡此名稱），但他夠用創新的術語已看到他走在時代之先，是真正的時代先驅者。這就如他以「異裝癖者」（Transvestism）一詞與同性戀者區分出來一樣具見地。

馬格努斯是德國的猶太人，他必然面對希特勒的追殺命運，他在柏林創辦的「性學研究所」也為德國納粹分子焚燒，幸而他當時在國外而逃過逼害。這便讓我想到基督教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及潘霍華(Bonhoeffer)，他們在反對德國納粹統治時，前者亡命天涯於美國，後者暗殺希特勒而命喪。但馬格努斯於一九三五年亡於法國，他還未真正領教過希特勒瘋狂的殺人手段；卻有機會研究同性愛而成為性學專家，比性學家金賽(Kinsey)更為先進。

時報出版能夠出版此中文翻譯本，實在為華人之福，讓台灣及國外人士能了解推動同志運動的這位先驅馬格努斯的生平 and 影響。並冀能藉此書內容引發更多人關注本地的同志平權及性別教育的推動。

推薦文

## 看見多元樣貌的每一分子

楊平靖(晶晶書庫發言人)

在全世界不同地區同志運動與性解放的發展裡，一路走來都有著不同的形式、論點與策略，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的座右銘——「科學是通往公平之路」，無疑是對他一生的所作所為與理念的實踐道出了最佳的詮釋。

在那個曾經對於同志晦暗不明的年代裡，充滿了歧視、偏見、刻板，甚至極端的打壓，他做出了首要的突破，也在同志運動萌芽的初期，對於研究「性少數」、「性多元」、「性的歧異性、特殊性」，提出了論述的方向。雖然現在我們有了更多元、更進步的發展，但不可否認的，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無疑開啟了正視「性」與「同志的性」的濫觴。

透過這樣的紀錄，我們也更能瞭解當時的德國對於歐洲的影響，更可以連結德國之於歐陸地區（例如瑞士、比利時、奧地利等鄰國）同志運動的相關性。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的努力，在初期的同志運動遭遇更多的困難與孤單，當年他對於同志平權與性研究的熱情與執著，相較於現代，無疑已經是超級進階。而時至今日卻仍有眾多人士是難以坦然面對「性的多樣性」，並對「性少數」持續抱持著無知與偏見。

時隔二十年，德國國會各政黨才勇於取消納粹法律對同志的有罪判決，而二〇一一年聯邦司法院編列了一千萬歐元，成立「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聯邦基金會」，也算是德國政府對赫希菲爾德實踐了轉型正義。

透過閱讀赫希菲爾德的歷史紀錄，鼓勵我們思考同志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持續努力於異性戀主流意識的洪流裡，不但看見同志，更是看見多元樣貌的每一分子，而那是你、是我、是我們每一個人，不分彼此！

## 英文版引言

時至今日，許多人對於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這個名字已經不再覺得陌生，至少對同志權利運動史感興趣的人是如此。或許他們都看過羅莎·馮·普朗海姆(Rosa von Praunheim)所拍攝的《男極圈》(The Einstein of Sex)這部電影。為了要讓人們能夠重新認識這位長久以來被遺忘的人物，我寫了這本書。我鎖定在赫希菲爾德他的生平及他的工作重點，並作了約略的考證。傳記的德文版為二〇〇五年 Heinrich & Henrich 出版社出版的「猶太人的縮影」系列的一部分，書的內容已翻譯出來，且根據最新的研究結果予以修訂。

赫希菲爾德為德籍猶太人後裔，他是一位德國社民黨黨員，是將性學當作一

門獨立專門學科來研究的創始者之一，也是一位積極為同志爭取權利的先驅，更是一位將科學這門學問與人性和公平作連結而奮戰不懈的科學家。

赫希菲爾德以「性的中間性」學說，來界定男女同志在自然界以及社會中的地位。這是一種前所未聞的概念，同時也是他透過嚴密觀察所得出的結論。在那樣一個認為男女性別的認定與其所有的「自然」屬性，有著巨大且不容改變的差異年代裡，這樣的概念模糊了男女之間的界線。它的完整意涵至今仍被重新拿來討論。

「科學是通往公平之路」是赫希菲爾德的座右銘。處處將此奉為圭臬的他彷彿置身在啟蒙運動時期的氛圍裡，科學成為他追求社會公平的不二手段。終其一生，他的主張總是爭議不斷。也由於赫希菲爾德所引用的科學論述不夠客觀，且研究主題和社會責任只聚焦在社會的性異常者身上，因而引發了諸多的爭議。

只要提起他的名字，人們總會連想到他力主廢除將男同志間的性行為定為刑事犯罪的「德國刑事法第一百七十五條」。就這樣的主張而言，赫希菲爾德是走在

他的時代前端的。德國刑事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直到他死後六十年才終告廢除。

就在德國人認定赫希菲爾德是猶太人而排斥他，且不再視他為德國人時，他被迫重新定義自己。他在一九三三年開始流亡後寫下：「德國人——猶太人——或是世界公民？」最後赫希菲爾德認定自己不是「世界公民」就是「三者皆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赫希菲爾德這個人和他的著作幾乎完全被世人所遺忘。就德國和歐洲地區來說這要怪罪於納粹黨羽，因為到最後只有赫希菲爾德自身從中倖存存活，他在柏林的研究所和科學文獻幾乎毀之殆盡，留下來的僅是一些殘株斷垣。

至於歐洲之外的地區，赫希菲爾德則是透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間的世界巡迴演講而引起關注的。儘管他在科學和國際同志權利運動的啟蒙上有其重要性，但他的重要著作卻沒有一本是以英文書寫而成：包括《愛的自然法則》(*Naturnetze der Liebe*)和《男與女同志》(*Die Homosexualität des Mannes und des Weibes*)、《異裝癖》(*Die Transvestiten*)和三冊一套的《性病理學》

(*Sexualpathologie*)，以及總共五冊的《性學研究》(*Geschlechtskunde*)。所以英語地區沒有人知道赫希菲爾德這號人物。

事實上，直到赫希菲爾德在世界巡迴演講之時，他才開始以「性學界的愛因斯坦」(*the Einstein of sex*)稱號出現在美國報紙上，而他的一些較小型著作也在許多偏遠地區以英文重新出版後，情況才有所改變。

赫希菲爾德僅活到能看到他的旅行演講紀錄《男男女女：一個性學家的世界之行》(*Die Weltreise eines Sexualforschers*)在英國和美國出版。還有在一九三二年出版未經授權且經刪減的《性病理學》翻譯本。哈利·班傑明<sup>2</sup>向他提出一份足致傷害的報告：「就我所知，你的《性病理學》第一冊的英文譯本正由本地的不良書商以美金五元出售中。那真是一本恐怖且令人倒胃口的譯作，由一為署名傑洛米·基伯斯(*Jerome Gibbs*)的人翻譯，且由紐瓦克(*Newark*)的朱利安出版社(*Julian Press*)在一九三二年出版。」

一九三六年，英國出現一本偽稱赫希菲爾德所寫，名為《性異常和性變態

者》(*Sexual Anomalies and Perversions*)的長篇大作，該書於一九四四年在美國再版發行，隨後又翻譯成德文回銷德國。但它實際上是由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編纂而成的。亞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嚴厲批評此篇著作：「雖然《性異常》一書以清楚且簡潔的方式，對人類各種性偏差行為作了相當完整的概論，且儘管它能確實地總結了一位著名先驅與自由主義者的一些著作，卻鮮少就它所描述的各种性異常行為就我們可以做到的觀察來解釋它們的成因。」

赫希菲爾德的另一本著作《種族主義》(*Racism*)的確在倫敦面世，也僅以英文出版。它的基本讀者似乎不多，就是那群曾經拜讀過他為被第三帝國驅逐者所寫，發表於布拉格德文報一系列文章的人。直到現在人們才終於明白，赫希菲爾德早已賦予「種族主義」(*racism*)這個詞一個新的概念，雖然它的完整意涵要在許久之後才得以發展完備。

關於性學領域的討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是由心理分析論，就是由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的實證方法論所主導。直至一九六〇年代末期，性

研究的主題之間才有了一次整合，而如今人們改由社會學的角度切入，同志解放運動也出現了全新的面貌。透過這個轉變過程，赫希菲爾德的著作才又得以在躊躇的狀態中慢慢地被重新提出。

之所以躊躇，是因為新一代積極分子對他的生物學與基因學的理论基礎，以及有關性研究中的醫學根據產生質疑，甚至不信任感。而此爭議至今未解。作家如賽門·列維(Simon LeVay)在二〇一一年就聲稱：根據他實際的觀察結果，異性戀者與同性戀者的腦部結構是不一樣的。

此外，還有狄恩·哈默(Dean Hamer)則主張：同性戀是一種基因的偶然，而這個論點也經常出現在赫希菲爾德的研究當中。這些和其他一些類似用來證明「自然性」的論點仍(或再次)被部分解放運動所引用，以駁斥同性戀恐懼症者的指責。

儘管如此，在早期的同志解放運動中，赫希菲爾德的行動主義和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也因此令人無法忽視。最近，赫希菲爾德完整的「性的中間性」理論

在「酷兒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再次以一種全新的價值受到重視。

在赫希菲爾德的一生當中，他將科學與行動主義的結合概念，經常受到醫界和政界同僚的指責。「科學」應該是全然客觀的，這是精神科醫師亞伯·摩爾(Albert Moil)所抱持的態度。然而純屬政治領域的同志權利運動，需要的是為了人權而堅定的奮鬥，並非「乞求」醫學理論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除了極少數曾經共事過或共同參與運動者還記得赫希菲爾德這個人之外，他在德國可以說是完全地被遺忘了。在赫希菲爾德的時代裡，德語是一種世界性的共通語言，那個時候即便非德籍的科學家也都至少必須具備閱讀德文的能力。然而在戰後只有一些語言專家閱讀他的著作。就是這些美國的專家朋友們，將這段被壓抑的德國首次同志運動史帶回給我們，並激發我們對於這位前輩的好奇。

自研究同性戀愛史的學者教授詹姆士·史特克利(James D. Steakley)辛苦研究彙編的書目《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的文章》(*The Writings of Magnus Hirschfeld*)

於一九八五年在多倫多面世後，也啟動了人們對於截至今日仍未完備的赫希菲爾德出版品的搜尋。在史特克利標有「未經檢視」的項目當中，仍有許多還尚未出土。其他如赫希菲爾德在一九三〇至三二年間的許多世界巡迴演講受訪紀錄，也可能還未經證實以供研究之用。

直到第二次同志權利運動展開，並開始對自身歷史感到興趣之際，才有了兩本赫希菲爾德的主要著作：《男與女同志》(*The Homosexuality of Men and Women*)和《異裝癖》(*Transvestites*)，被麥可·隆巴蒂奈許(Michael Lombardi-Nash)翻譯成英文，並由弗恩·布洛(Vern Bullough)贊助出版。後者尤其清楚地說明了赫希菲爾德的著作不僅針對同志，同時還涵蓋了更廣泛的「多階性的中間性」<sup>3</sup>範圍。此範圍現在多以英文縮寫「LGBTQ」<sup>4</sup>來描述。

在此我必須提到一本不是赫希菲爾德所寫，卻是由他所贊助發行並寫下結語的書籍《一個男人的少女歲月回憶錄》(*Aus eines Mannes Mädchenjahre*)，是使用假名「無名氏(N.O. Body)」所寫的。它是時任「聖約之子會」柏林招待所主管的卡

爾·馬莎·貝爾(Karl M. Baer)所寫，而貝爾直到一九三八年移民巴勒斯坦之前一直都是該單位的主管。這本書以第一人稱敘述了首位動變性手術的個人故事。黛博拉·西蒙(Deborah Simon)翻譯的英文版本於二〇〇九年由賓州大學出版社(Pennsylvania Press)發行。

隨著赫希菲爾德重新被發現的浪潮，他的英文版傳記也陸續出版。首先是夏洛特·沃爾夫(Charlotte Wolff)於一九八六年出版但早已絕版的版本。她和赫希菲爾德同為德國難民，雖然年輕時在柏林行醫與赫希菲爾德同期，卻一直到了晚年才對他的著作產生興趣。

最近，艾琳娜·曼奇尼(Elena Mancini)在著作《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和性自由的追求：第一次國際性自由運動史》<sup>5</sup>裡也試圖替赫希菲爾德對同志解放運動的貢獻討公道。

如今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性研究者，這個名字在德國再次為人所熟知，對於這種改變，原作者對於透過與「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協會」的合作而能有

所貢獻感到驕傲。

## 德文版引言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教授，就連他的長相肯定也是所有猶太怪物中最惹人厭的。」這是納粹作家漢斯·迪波(Hans Diebow)在他一九三七年所出版的可悲著作《永遠的猶太人》(*The Eternal Jew*)中對這位性研究者的詆毀。同一年，在紐倫堡(Nuremberg)所謂的革命博物館展出了赫希菲爾德的半身雕像，掛牌上寫道：「可愛的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二十世紀最肥的低頭豬<sup>1</sup>。」

到底要從事什麼行業——像這樣一號人物——才會讓納粹想把他當作可恨的猶太樣板遊行示眾呢？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醫生，身為醫學博士和醫務諮詢委員的他，一八六八



年出生於波美拉尼亞的科爾貝格<sup>2</sup>，赫希菲爾德終其一生不僅名冠德國，更是一位聲名遠播的性學研究者。

他開創了性方面的研究領域，並擔任過「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第一個為同志爭取權利的組織）主席，並於一九一九年在柏林創立主持「性學研究所」。一九三三年，他所有的努力成果被德國納粹分子無情地摧毀殆盡。當時的赫希菲爾德正在巡迴世界演講，後來再也沒有回到德國。他於一九三五年流亡到法國尼斯，並在當地辭世。

一九四五年之後，赫希菲爾德幾乎完全被遺忘了，圈內的少數倖存成員無法恢弘他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成果並接續他的工作。赫希菲爾德的一些親近同事若非已經過世，就是未能從流亡中歸國；而少數倖存者在第二世界大戰後也不再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或行醫，更遑論承續他的遺志。同志權利運動遠不及一九二〇年代那麼受到重視。實際上，在一九五〇和六〇年間，德國並沒有公共表達的空間。一九六二年，有鑑於納粹的宣傳仍深植人心並對聯邦共和政府法令影響匪淺，漢

斯尤阿信·舒普斯<sup>3</sup>不禁要說：「就同志者而言，第三帝國還沒有結束。」

赫希菲爾德並未能創立一所「學院」。他的性學研究所是非學術的研究機構，不僅受限於更高階的專業研究能力；此外，他還如同多年老友庫爾特·希勒<sup>4</sup>所形容的，是一個有著明顯偏好與喜惡的人，所以無法培訓出願意且能夠接續他志業的繼承者。

赫希菲爾德在一九二〇年間曾經考量過幾個人選，可是他們全都拒絕了他。這些人不是投身其他專業領域，就是太具有個人特色，以致於赫希菲爾德無法依自己的喜好「將他們塑造成另一個他」。到最後只剩下兩位年輕友人兼跟隨者：卡爾·吉斯（Karl Giese）於一九二八年在布律恩<sup>5</sup>，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另一位則是香港的李兆通。兩人皆未能實現他的願望。

赫希菲爾德的同志解放概念，如同他的拉丁文座右銘「科學是通往公平之路」（Per scientiam ad iustitiam）一樣，一直流傳至今，只不過有了不同的科學根據，並非直接師承赫希菲爾德罷了。

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漢斯·吉斯<sup>6</sup>和他的「德國性學學會」，一如赫希菲爾德在稍早時所作的嘗試，試圖利用科學發現來促成德國刑法有關同志法條的修改。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也曾有人以社會學的論點作過相同的嘗試。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一個新的同志運動開始成形，並四處尋找它的歷史根源。赫希菲爾德及他的著作就在這種情況下重新被發掘了出來。一經挖掘始知赫希菲爾德留給後人的遺產是如此複雜，而有關它的爭論才正要展開。

## 第一章

# 赫希菲爾德的生平記事 與同志運動起源

## 來自猶太家庭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於一八六八年的五月十四日出生在波羅的海波美拉尼亞海邊的科爾貝格，父親名赫爾曼·赫希菲爾德(Hermann Hirschfeld)是內科醫生，母親名弗莉德里克(Friederike)。

父親，赫爾曼·赫希菲爾德，是一位醫學博士，來自新斯德丁<sup>1</sup>；母親弗莉德里克，本姓曼(Mann)，來自瓦爾塔河的伯恩斯坦<sup>2</sup>，兩家原本是親戚。赫爾曼的父親和弗莉德里克的祖母是兄弟姊妹，弗莉德里克·曼婚結得早。當時弗莉德里克正就讀於柏林女子寄宿學校，赫希菲爾德前去拜訪二八年華的她，隨後便拜託一位雙方熟識的友人提親，兩年後他們就結婚了(一八五五年)。

赫爾曼·赫希菲爾德完成了醫學學業，其中包括一篇在病理學家魯道夫·菲爾紹(Rudolf Virchow)指導下完成的論文。論文上的拉丁文簡歷在最開頭處寫著他驕傲的聲明：「我是猶太人」。赫爾曼屬於在一八四八年之前的艱困時期就讀

於柏林大學<sup>3</sup>的一代。畢業後，他在第一次什勒斯維希戰爭期間前往什列斯威-霍爾斯坦服義務役，並於一八五〇年在格賴芬貝格<sup>4</sup>開業，兩年後搬到科爾貝格。

科爾貝格做為普魯士的要塞城鎮，多年來(直至一八一二年)都拒絕猶太移民。但文件顯示，科爾貝格早在一八二二年就有一個猶太社區。當赫希菲爾德搬到那裡的時候，它的規模還很小，然而到了赫爾曼·赫希菲爾德小有名氣之後，他被選為猶太社區議會代表。此議會是一個自治組織，幾乎所有的猶太成年人在這個組織中都會被分派職務。在一些商人之中他是唯一的「知識分子」，直到年紀非常大時仍被一再選為代表。

一八七一年，他成為這個猶太社區的主席，此時他已是該城市的名人了。他遵循著老師菲爾紹的傳統，提供了許多不凡的公共服務，其中包括了建造下水道系統，以及將自來水引至位於舊城牆外的科爾貝格口的引水道工程，而這些都是為了讓科爾貝格發展成海濱度假勝地所需的改進工程。

赫爾曼一度還擁有自己的海水浴場和鹹水水療館——「北浴」，然而他的企業

並不是非常地成功。到了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戰爭期間，人口只有兩萬人的科爾貝格關了大約五千名的戰俘，赫希菲爾德因為提供法國戰俘醫療服務而獲頒一枚普魯士紀念勳章。最後，他以相當大的歲數被任命為醫務諮詢委員。在赫爾曼去世後一年（一八八五年），科爾貝格居民通過全市募捐，在濱海步行大道上建造了一座紀念碑，以表彰這位他們敬愛的內科醫師。

紀念碑豎立委員會成員涵蓋猶太社區、市諮詢委員、地方報紙、航海俱樂部、商賈人士等，甚至包括地方軍事基地的隨隊路德教會牧師。然而不到五十年的時間，科爾貝格居民就再也無法忍受在他們的城市當中存在一座為一位猶太人打造的紀念碑——一九三三年納粹掌權後隨即將其摧毀。

有關弗莉德里克·赫希菲爾德的生平我們所知不多，只知她本姓曼，約莫比她的先生多活了二十年。弗莉德里克有八個兄弟姊妹，其中一位為律師兼公證人朱利烏斯·曼博士(Dr. Julius Mann)。朱利爾斯·曼，這位法律諮詢委員一直擔任斯德丁<sup>5</sup>猶太社區的主席直到過世。

赫爾曼與弗莉德里克的婚姻總共生了十個（或許十一個）小孩：馬格努斯上面有伊曼努耶爾(Emanuel)和愛德華(Eduard)兩個哥哥，前者後來成為醫生，後者則成為藥劑師。伊曼努耶爾移民美國，先在密爾瓦基市的天主教醫院服務，爾後在伊利諾州芝加哥北邊的溫內特卡開了一家診所。他在一九二五年去世於瑞士的達沃斯。

愛德華的藥房生意失敗後，跟隨他哥哥的腳步也去了美國，不過就在他的芝加哥醫療所開幕後不久，卻因意外遺留下來的痼疾而辭世。於是他的兒子赫爾曼便遷去與伯父伊曼努耶爾同住，後來在一家名為Orenstein & Koppel的機械工程公司實習期間與當時定居柏林的阿姨法蘭西斯卡·曼(Franziska Mann)同住。之後赫爾曼獲得叔叔馬格努斯的支助，在柏林開了一家集郵社。他在納粹時期以所謂的異族通婚方式艱困地存活了下來，於一九五三年回到美國，並改名為哈里·菲爾德(Harry S. Field)。

愛德華的遺孀愛麗斯(Elise)，本姓懷爾(Weil)，與她的繼女勒興<sup>6</sup>一同住在

德國漢堡，兩人後來都遭到驅逐並且遇害。

馬格努斯的姊妹計有瑞查(Recha)、阿格內絲(Agnes)、弗蘭奇絲卡(Franziska)和珍妮(Jenny)。其他姊妹——布蘭卡(Blanka)、瑪格麗莎(Margaretha)，再加上一個未命名的和沒報戶口的奧爾加(Olga)——都死於孩童時期。在一八八六和八七年間，有一位來自波森的李察·坎托洛維奇(Richard Kantorowicz)以養子身分住在赫希菲爾德家中。他與馬格努斯於一八八七年同時獲得科爾貝格天主教學校的學士學位，後來他不僅前往非洲做研究，還曾擔任過盧安達的德國駐外公使<sup>7</sup>。坎托洛維奇於一八九三年受洗成為新教徒，並令家裡的所有男性成員改姓坎特(Kandt)。

赫希菲爾德的大姊瑞查嫁給馬丁·托比阿斯(Martin Tobias)，他來自於一個定居梅克倫堡的猶太家庭。這對夫妻搬到泰特羅並育有三名小孩。一八九〇年，托比阿斯從莫里茨·貝倫德(Moritz Behrend)——他岳父的同事兼競爭者——的遺孀手中頂下一間科爾貝格的鹹水水療館。而瑞查·托比阿斯經營的附屬旅館，

直到一九〇〇年都還繼續營業。

托比阿斯一家後來也搬到了柏林。一九二〇年代，守寡的瑞查搬進她弟弟的性學研究所所在的公寓，並且多租了幾間房用來招待訪客。她的兒子喬治(George)在柏林附近的比斯多夫(Biesdorf)當眼科醫生，他也因為異族通婚而逃過戰爭的劫難。瑞查則在一九四二年被驅逐到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因年事已大，沒過多久就辭世了。她的女兒瑪迦(Marga)不幸淪為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受難者；兒子古斯塔夫(Gustav)和妻子則死於柏林空襲。

艾格尼絲始終未婚，直到一九二二年過世前都住在科爾貝格，經營父母親所遺留下來的房舍，她把它改為民宿，取名「赫希菲爾德博士的家」。珍妮嫁給施泰瑙(Steinau)的朱利烏斯·豪克(Julius Hauck)後曾居於柏林和科爾貝格兩地，後因婚姻不幸福而分居。她在姊姊艾格尼絲過世之後繼承了科爾貝格的家庭民宿，為了紀念艾格尼絲而將它改名為「艾格尼絲別墅」。

他們的孩子當中有一個女兒伊娃(Eva)於一九二四年死於猩紅熱；他們

的兒子魯迪(Rudi)則在一九三〇年娶了格爾達·貝蒂·馬庫斯(Gerda Betty Marcuse)，兩人帶著他們的新生女兒露絲·加布里爾(Ruth Gabriele)於一九三八年躲過了納粹的魔掌，逃到英國後再轉往澳洲。珍妮和朱利爾斯·豪克長眠於柏林白湖的猶太墓園裡。

弗蘭奇絲卡的婚姻也不幸福，丈夫莫里茨·曼(Moritz Mann)是她的親舅舅，是一位旅館經理，他先是在斯德丁後來轉往柏林市中心區，位於貝倫斯路與弗里德里希路轉角新開張的室內購物廣場中附設的帕先根旅館工作。弗蘭奇絲卡·曼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作家。她大部分的作品都圍繞著「寂寞」這個主題，這在她的真實生活當中再熟悉不過了。弗蘭奇絲卡有三個兒子，其中兩位在她死後不久也跟著辭世。他們兩人和他們的父親一樣長眠於白湖的猶太墓園。第三個兒子則躲過了納粹爪牙的魔掌，逃到英國。

馬格努斯和兄弟姊妹們在科爾貝格度過了愉快的童年。蘭奇絲卡·曼僅僅在作品中緬懷過那段時光，同時也見於一九二七年弗蘭奇絲卡與馬格努斯共同

執筆，在他們父親的百年冥誕時獻給父親並刊載於《波美拉尼亞科爾貝格報》(Kolberger Zeitung für Pommeren)的紀念文中。令人訝異的是，儘管赫爾曼·赫希菲爾德為科爾貝格報所寫的每週專欄和他的醫生工作同樣受到賞識，馬格努斯與弗蘭奇絲卡都未曾提及他最終且最重要的職務。

多年以來，他們的父親一直都是猶太社區議會代表，最後還當上了主席的這個事實，在紀念文中從未出現。他的職務不可能不為他的家庭生活帶來影響。不過我們卻無從得知這對父母是如何維護猶太傳統的。僅有一次模糊地提到這家人每個星期五都在他們的祖母家聚會。至於他們是否在這個時候信守安息日，我們就無從得知了。

馬格努斯在成為大學生後沒幾個學期，就自命為宗教異議分子。我想弗蘭奇絲卡也有類似的情況。我們僅能從馬格努斯在流亡時保存下來的訪客名錄中，找到他喜歡宗教教育的參考文獻：這裡面他保留了一張讚揚科爾貝格資深猶太祭司薩洛蒙·戈爾德施密特博士(Dr. Salomon Goldschmidt)的紀念卡片。

## 大學教育——捨棄最愛，改念醫學

馬格努斯在父親過世時才十七歲，那時候的他還在科爾貝格天主教學校就學。父親赫爾曼·赫希菲爾德留下的遺產並不足以維持他的家庭，所以馬格努斯的教育費用必須靠親戚們資助。他那個在斯德丁的伯伯朱利爾斯·曼想必然是贊助者之一。自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四年，馬格努斯的求學地點分別為布雷斯勞<sup>8</sup>、當時還隸屬德國的史特拉斯堡、慕尼黑、符茲堡以及柏林。

他原本修習現代語文，後來因現實的考量而改念了醫學；馬格努斯於一九二八年回想時寫道：「我自願捨棄了我的最愛，這並非是不忠於自己，只是有太多的外在因素促使我不得不改變心意，而改念自然科學和醫學。我的內心裡還是覺得跟自己比較貼切且心儀的職業是新聞記者、文人、作家、詩人、藝術家，而不是醫生、教授或最高樞密醫療諮詢委員<sup>9</sup>。當我視後面這些人為同事或前輩時，卻意識到前者才是為了真善美的自由和我一同並肩作戰的戰友。」

在史特拉斯堡唸書和服役已是他們家的傳統，他的兩位兄長伊曼努耶爾和愛德華如此，馬格努斯也不例外地在史特拉斯堡就讀過兩個學期（1888-89），並服完他的兵役。伊曼努耶爾在一八九〇年前往阿爾薩斯的礦業城市聖克洛依茲因雷巴托<sup>10</sup>行醫。馬格努斯憶起他在史特拉斯堡當學生時，一位對他影響深遠的老師：病理學家弗里德里希·丹尼爾·馮雷克靈豪森（Friedrich Daniel von Recklinghausen），他督促他的學生：「觀察，各位，要觀察！」

赫希菲爾德認為他才是真正的「菲爾紹信徒」，因為他信奉這個「發生在上個世紀初的數十年間，摒棄自然哲學<sup>11</sup>的臆測，並以精確數據取代理論思考的研究潮流」。他後來宣稱在自己的專門研究領域裡也奉行了這個信念：「男同性戀<sup>12</sup>並不是透過坐在桌燈下翻翻書、看看研究報告就能理解的現象，它靠的是對同性戀者本身的研究。」

赫希菲爾德於一八八九—九〇年間在慕尼黑就讀。從那裡，他去拜訪了住在巴伐利亞的韋里斯霍芬神父瑟巴斯堤安·克奈浦<sup>13</sup>。自然療法並不是大學教育的

學習科目，有興趣的學生必須自己尋求進一步的訓練。

赫希菲爾德在一八九〇年二月完成他的醫學預備考試，隨後便在斯特拉斯堡服半年的兵役，接著再繼續修完他的臨床學期，其中有三學期在海德堡，一學期在柏林。他於一八九一年的十二月八日通過時任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醫學系主任埃米爾·杜波伊斯-雷蒙德(Emil du Bois-Reymond)的口試，並在一八九二年二月十三日成功地為論文辯護後獲頒醫學博士學位。

精神病兼神經科醫師伊曼努耶爾·孟德爾(Emanuel Mendel)幫他擬定了論文題目「流行性感官所帶來的神經系統疾病之研究」。至於他的考試委員，除了孟德爾外還包括有外科醫師海恩里希·阿道夫·馮·巴爾德利本(Heinrich Adolf von Bardleben)、婦科醫生阿道夫·古謝羅(Adolf Gusserow)，以及格哈特和菲爾紹兩位教授。赫希菲爾德於一八九三年在符茲堡通過他的國家醫學考試。

同一年夏天，赫希菲爾德做了首次的國外長途旅行，他趁著到芝加哥參觀世界博覽會的機會，順道拜訪了在美國的親戚。他的哥哥伊曼努耶爾那時候住在芝

加哥北邊，而更早移民的叔伯家則位於威斯康辛州的密爾瓦基附近。赫希菲爾德利用為報紙寫報導(早已失傳)的報酬來支付旅費。在從美國回來的途中，他還繞經北非及義大利，然後於一八九四年在馬德堡-新城(Magdeburg-Neustadt)定居下來並開業。

## 在馬德堡的首次執業：自然療法的實踐

我們無法得知赫希菲爾德為何會定居於馬德堡，不過卻知道關於他的醫療項目，包含日光和新鮮空氣療法以及水療法。赫希菲爾德從父親那裡認識到海水、鹹水以及泥土治療的價值。他是當時少數幾個受過學院訓練在倡導並確實使用自然療法的醫師之一。自然療法本屬於醫學外行人的領域，正統醫師若加以倡導，往往會和自己的專業有所衝突。果不其然，沒有多久，對赫希菲爾德的醫療爭議便



接踵而至。

馬德堡當地的正統醫生指控他對一位血液中毒患者的治療有疏失，因為他拒絕給予患者「藥用補酒」。最後患者死了，醫學同行所提出的訴訟最後作出對他有利的判決。赫希菲爾德為他的報告標上「禁酒萬歲」的標題。但是經歷此事件後，他也無法再待在馬德堡。

一八九六年，赫希菲爾德遷往當時在柏林城門外的一個富裕獨立的城市夏洛滕堡。他的第一家診所位於市政府<sup>14</sup>後面，但旋即便搬到當時為柏林大街一百二十一號<sup>15</sup>的一處較大且較雄偉的地方，建於一八九九年的新夏洛滕堡市政府就在它的斜對面。自然療法仍為他工作的主要項目之一。

赫希菲爾德在馬德堡時已是自然療法雜誌的講師與作者。直到一九〇〇年為止，他除了行醫之外，還編輯了《家庭醫師》(Hausdoctor)——一本「專為健康與生活的自然療法而編的週刊」。在雜誌中他不僅提供外行人一些醫學建議，還與讀者分享勵志文章和自己所寫的詩。他也於一八九七年擔任「職業自然療法倡導

者公會」訓練課程的主考官。一八九八至九九年間他還開了一門為期九個月的課程，教授自然療法的解剖學和生理學。

赫希菲爾德指出了「生活改造運動」該有的一些方向，這個運動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人為了反對工業化帶來負面結果而發起的運動。他不僅再三地大聲疾呼反對酒精，而且極力讚揚生活改造運動中的安居運動<sup>16</sup>，安居運動主張供給工人階層較健康的生活安排。他簽署了多份反對疫苗注射的陳情書——就在第一次使用活體疫苗對抗肺結核的試驗之際，主張了除了光線、空氣和太陽之外，健康的營養素才是對抗這種文明疾病的預防良方。

雖然赫希菲爾德也主張無產階層應該多吃黑麵包，不要為了燉菜鍋裡的那幾塊肉而汲汲營營，但他本人應該也不是位素食主義者。他在一九二〇年代參加了阿道夫·寇赫(Adolf Koch)所帶動的裸體運動。赫希菲爾德並不太理會那個時代對穿戴的嚴格規範：據說他從不戴帽子。

## 赫希菲爾德的私人生活與交往

路德維希·拉維-連茲醫生(Ludwig Levy-Lenz)在他的回憶錄曾就赫希菲爾德的生活形態和工作習慣作了如下的描述：

早上五點鐘，他會坐在一扇法式大窗戶前開始工作，那裡是遠眺動物園的絕佳視野。無論住在哪裡，他都想要擁有一個可以直眺遠方、寬闊視野的地方；這啟動了他的心靈……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H.)視音樂為娛樂。他曾住在偉大小提琴家姚阿幸(Joachim)住過的房子，他秉持著音樂家掌控演奏會、三重奏、四重奏的精神，每月一次，吸引一群名人賓客來造訪他的家……

M.H.本身的生活非常簡單，唯一的豪華便是準備一頓好吃的招待客人；但他卻因為罹患糖尿病之故，而不能在宴會中盡情地享受喜好的美食。M.

H.不是一位非常聽話的病人，除非有人看著，否則他會一口接一口地吃下蛋糕。除了這個以外，他總是安靜地沉浸在書堆裡並與知識水平相同的人士應酬——過的完完全全是一種智者的生活。

赫希菲爾德從不談論私事，任何他可能曾保留著的日記也都遺失了。而他為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二十五週年慶而寫的一系列自傳式文章「從以前到現在」(Von Einst bis Jetzt)，雖說是一部「運動史」，卻略去了任何涉及個人的訊息。他認為自己是「公眾」人物，卻也深知要如何在全眾目睽睽之下，毫不倖作地保有自己的私人生活。因此我們並不清楚他五十歲以前——也就是他在與卡爾·吉斯(1898-1938)有了友誼之前，是否曾有過生命伴侶或任何長期的友人或關係。只能看是否找到遺失的日記才可獲知這方面的訊息？

他的姊姊弗蘭奇絲卡在一九一八年的生日信上提到：「你獨自住在你那可愛的房子裡。」就在這個時候，肯定只會早不會晚，但也可能早在一九一四年，約

莫當他在拍教學電影《與眾不同》(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之時，赫希菲爾德遇見了吉斯，一個屬於工人階層的年輕男子。吉斯於一九一九年搬進研究所與赫希菲爾德同住，他在那裡照顧收藏品和檔案。艾倫·貝加德(Ellen Backgard)在她的回憶錄中形容他是「家庭主婦」，甚至有人說他喜歡編織和布置家裡。他也幫赫希菲爾德整理衣櫃，這是赫希菲爾德最不擅長的。

儘管他們的生活是如此親近，並且經常一起出現在公共場所，「圈外人」顯然毫不懷疑他們真正的友誼本質。一位長期在「世界性改革聯盟」共事的同事保羅·克力什(Paul Krische)和他的妻子瑪麗亞(Maria)，多年之後才知曉，不僅吉斯，連他們親近的友人赫希菲爾德也是同志，而且兩人還是一對。

其他的人就知道得更多一點了。吉斯於一九三五年秋從他的流亡地布律恩，寄出給優生學家、性教育者馬克斯·侯丹(Max Hodann)的英文信上寫道：「你可能早已知曉，赫希菲爾德的過世對我來說，不僅是我老闆的過世。」

赫希菲爾德在世的最後一年有了第二個朋友——來自中國的李兆通(1907-

1993)。於是他們兩位年輕人必須一起分享赫希菲爾德的感情。侯丹的第二任妻子當時還沒有和他離婚，她在巴黎遇到了他們三人，並於事後在她從哥本哈根(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寄給在蘇黎世的弗里茲(Fritz)和波萊特·布魯巴賀(Paulette Brupbacher)的信中傳遞了流亡八卦：「馬格內西亞(Magnesia)阿姨又在巴黎玩他的愉快把戲。這一次與兩把火住在一起(道和小卡爾)。最精彩的是：他們兩個都非常喜歡吃這位老頭兒的醋。想必是真愛在作祟吧？」

赫希菲爾德從未明確地「出櫃」過。如此公開的表白有違他的自我形象，以及一個應該要毫無偏見地去研究世界各種現象的自然科學家的角色。

## 經濟生活靠行醫和大量出版的收入

關於赫希菲爾德的經濟狀況我們所知不多。他沒有從他父親那裡獲得任何的

遺產。赫希菲爾德的行醫收入和大量的出版活動，顯然為他帶來足夠的所得，讓他能夠過著算不上上流階層，但肯定是紮紮實實的中產階層生活。不過豐厚的收入偶爾也會引起政治對手和嫉妒者的質疑。

例如，在反猶太人的某一波抹黑行動當中就出現一些謠言，指控赫希菲爾德替馬克斯·施波爾(Max Spohr)出版公司編輯《性的中間性年鑑》(*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時收受不成比率的高報酬，因而傷害了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的信譽；甚至指涉他利用行醫獲知的病歷資料來勒索同性戀病人。但如果有任何的指控部分屬實的話，他的對手肯定會馬上讓他一槍斃命的。赫希菲爾德顯然是個受人愛戴的人，被他治癒的病人都願意支付高額的診療費用。不過他同時也收付不出醫療費用沒有錢的病人。他們不僅可以到「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SHC)辦公室工作，甚或在一九二〇年間還可以到性學研究所當管家，以工作來支抵醫藥費。

他將全部的現金——根據一九一八年的納稅紀錄，以他可課稅年收入為兩萬七千五百至兩萬八千五百馬克推估，應略低於四十萬馬克——投資買進一棟作為研究所使用的建築物，事後證明這麼做對赫希菲爾德是有利的。至少捐贈的不動產還可以保值，不像其餘的捐款(根據各種不同的資料來源顯示，應介於三萬和十萬馬克之間)都成了通貨膨脹的犧牲品。指定作為支付如此巨大的一間屋子開銷之用的利息收入，在過不了多久便不敷使用了。

赫希菲爾德曾於一九二九年載明，他沒有從研究所的經營中拿過任何錢，他的生活費用全靠出版、演講、研究報告等等的收入，不過也還不至於到一貧如洗的地步。一九二〇年代末期，赫希菲爾德的表兄弟李歐·邁亞(Leo Meyer)幫他投資了阿姆斯特丹的蜂巢(Bijenkerf)百貨公司，赫希菲爾德於是將從中的獲利拿來當作研究所和他自己的儲備金。

之後，赫希菲爾德開始與製藥業簽約合作，以求在經濟上嘉惠自己和研究所。不過合約上載明的義務不僅為他帶來極大的醫學倫理負擔，有的時候甚至還必須違背它們。他與一家製造宣稱有避孕效果的「帕騰塔可斯」(Parentex)的茂

卡藥廠(Vauka)所簽訂的合約，就要他幫藥廠一些與醫學驗證結果不符的產品背書，亦即保證「帕騰塔可斯」是值得信賴的預防懷孕良方。儘管赫希菲爾德和他的同事理查·林塞特(Richard Linsert)已在較早的文件中證實並建議此種避孕膏必須與保險套合用。

一九三三年之前幾年，赫希菲爾德、研究所和所內資深內科醫生伯恩哈德·夏皮柔(Bernhard Schapiro)因醫治勃起功能障礙藥的上市，而有了相當優渥的收入。「帖斯提佛坦」(Testiforan)是一種動物器官混合物，宣稱成分中有冷凍乾燥後磨成粉的腦下垂體前葉和公牛睪丸組織，能有效維持男性荷爾蒙(睪酮尚待發掘)的正常分泌。雖然此藥獲得醫學專業報刊的好評，然而它並未能替最初的漢堡製藥商普羅蒙塔(Promonta)或它的授權商帶來財富。直到赫希菲爾德和夏皮柔與一位精力充沛的柏林企業家馬克斯·曼金斯基(Max Baginski)簽約，將「帖斯提佛坦」的配方稍加改變，並更名為「提圖斯-珍珠」<sup>17</sup>，推銷給國內外一般人使用後才大賺其財。

赫希菲爾德顯然將部分的權利金投注在所內雜誌《啟蒙》<sup>18</sup>上。後來，這些錢，加上本地演講的一些酬勞，使得他能無後顧之憂地作大規模的世界巡迴演講(一九〇三—三二年)。一九三三年之後，納粹機構抑或最高主管當局柏林警察主席團的經濟部接管了這筆權利金，從此赫希菲爾德再也拿不到半毛紅利。

一九三二年底，資深研究所行政主管弗里德里希·豪普特施泰因(Friedrich Hauptstein)不但無法解釋一筆將近九萬馬克的研究所收支差額，並且時有未能提交基金監事會所要求的年度報表(基金會檔案已遺失)。明顯疏於管理研究所的赫希菲爾德不願相信豪普特施泰因會中飽私囊，但也因此對他失去信任，並撤銷了他與研究所的委任律師關係。在此之前，這個委任關係一直載明在他的遺囑裡。赫希菲爾德估算研究所在一九三三年被迫關閉時，他被納粹沒收的資產價值約有十三萬二千馬克。

沒有任何紀錄記載赫希菲爾德流亡生活的經濟來源。他企圖從「提圖斯-珍珠」在瑞士的契約經銷藥劑師那裡直接取得權利金，但礙於當時的德國外幣兌換

規定而終告失敗。蘇黎世藥劑師黑百生博士(Dr. Hebeisen)所保留的紀錄當中並沒有出現任何一筆直接支付的記載。赫希菲爾德多次被迫向來自富裕家庭的中國朋友李兆通借貸。

在法國的時候，赫希菲爾德有一些來自出版合約和期刊發行的收入。例如，一九三三年，他曾幫畫刊《哇啦》(Voilà)長期寫系列文章而獲得稿酬；出版商伽利瑪(Gallimard)也付給他著作翻譯版權權利金。他的財富足以讓他經常旅行。一九三五年初，赫希菲爾德在尼斯租下並裝潢了一間大公寓做為退休後的家園。

## 猶太教、猶太復國主義與反猶太主義

赫希菲爾德在意識上對家庭猶太教傳統的抗拒始於初入大學的前幾個學期。一八八七年，在布雷勞斯勞就讀的他在宗教欄中登記的是「猶太教」。後來，同一

欄位總是填上「diss.」的字樣，「diss.」為「宗教異議分子」(dissident)的縮寫，這麼做表示他已經脫離父母的宗教團體但也沒有轉變為基督教徒。受到本身科學研究的影響，特別是對那位把達爾文進化論引進德國耶拿的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所抱持的高度興趣，赫希菲爾德也因此接觸到了「一元論」這種可以替代宗教的科學理論。

赫希菲爾德幾乎沒有保存下他在柏林時與猶太家庭或猶太機構接觸的紀錄。既然是以宗教異議分子自居，他不屬於任何猶太團體，更沒有信守它的宗教習俗。就和許多同時代的猶太人一樣，他過的也是基督教節日。在他的《遺記：筆記本二》(Testament: Notebook II)中，所登錄的條目日期也加註了基督教節日。

他在一八九九年捐款給薩克斯夫婦(Mr. and Mrs. Sachs)所創建，位於奧拉寧堡附近列尼茨的猶太療養院的真正目的和理由並未明說。這間療養院在當地歷史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於一九四五年之後，通往療養院的道路就被命名為赫希菲爾德路。該棟建築物後來改建成智能障礙兒童之家，並於一九八八年由當時的

一位董事發起，將其命名為「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之家」。

赫希菲爾德的文學興趣牽引他接觸猶太復國主義（又名錫安主義）的思想。就在他的世界巡迴演講之旅進入尾聲，於一九三一年在特拉維夫的時候，他再次和女演員漢娜·羅維娜（Hanna Rovina）相遇。赫希菲爾德曾於一九二六年在諾倫多爾夫劇院以希伯來語演出的《來去兩個世界》（*Dybuk*）劇中見過她，此劇經比亞利克改編，由哈必瑪劇院製作，安斯基導演。

當他第一次到巴黎旅行時還是個學生，在那裡他結識了馬克斯·諾爾道（Max Nordau），「在他巴黎的家中……我消磨了好長一段時間。在那段時間裡，有關於猶太復國運動成功與否的各種不同意見，都被提出且熱烈地討論，其中有人認為這是解決猶太問題的唯一辦法，卻也有人認為這種運動會屈服於反猶太主義，因而不敢貿然走上極端。」他在一九三五年時回憶寫道。

這些際遇還不足以讓赫希菲爾德成爲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不管如何，他至少參加了一九一七年的研討會<sup>19</sup>。他猶記得當「那位因多起官司為我所熟知，且

具絕佳知識敏感度和終極人性的律師阿爾弗雷德·克利（Alfred Klee）發出「猶太人們！我們有了一個國家了！」的開場白時，美輪美奐的柏林市政中心裡那群雀躍不已的群眾」。

他並不贊成恢復使用希伯來語。赫希菲爾德認為此舉會帶來孤立，而孤立會阻礙與鄰居的融合。赫希菲爾德在寫作的時候總是避免觸及與純正概念有關的分子化議題。他覺得這麼做有風險：「經驗告訴我們，語言上的孤立顯然會觸動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敏感神經。」

儘管他的英文在世界巡迴演講中已經好到某種程度，不過在思考流亡到「哪裡」的時候，個人總因語言的隔閡，從沒把定居巴勒斯坦考慮在內。這處聖地、《聖經》重大事件的發生場景——他認為《希伯來聖經》（*Hebrew Bible*）和《新約聖經》（*New Testament*）是平等的——無論身爲一個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或是從文化歷史的觀點來看，都屬於他傳統的一部分。做爲一個生活改造運動的行動者，赫希菲爾德比較像那些在特拉維夫海邊的年輕人：

多麼大的對比啊……沿著耶路撒冷哭牆哭泣的猶太哈西德派(Chasidic)年輕教徒，以及特拉維夫海邊眼裡閃爍著愉悅火花的清新男女之間。這群有著令人欣羨的活力和清新純真的年輕人稱自己為「哈魯茨」(Chalutzim)，也就是「開拓者」的意思，遇見他們算得上是在巴勒斯坦時幾件令我印象深刻的的事情之一了。

穿著簡單(沒有戴帽，光著脖子和雙腿)、態度純真，顯然深受現代漂鳥運動和童子軍的影響，他們似乎充滿著歡樂、力量和對生命的肯定，似乎已經克服了這種年齡極易產生的一切沮喪和無意識的情色自卑情緒。

赫希菲爾德的孤立，抑或和他的猶太傳統，保持距離仍避免不了敵人污衊地罵他是猶太人。首先只是一些反猶太的攻擊。在奧倫堡事件<sup>20</sup>發生期間，這種污衊的聲音開始高漲，並且針對個人。這段期間的諷刺漫畫總是幫赫希菲爾德畫了

個猶太鷹勾鼻。埃米爾·威特(Emil Witte)於一九一四年出刊的煽動性小冊《齊格弗里德的三叫聲》(Drei Siegfriedrufe)就是其中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它的一些毀謗本事皆傳承給了《猶太科西納》(Semi-Kürschner)這本反猶太參考書，後者在一九二九年第二版中花了不少的篇幅專寫赫希菲爾德，而那些污衊又直接被納粹拿來做宣傳。

一九二〇年代，此類的攻擊持續出現並且變得十分暴力。赫希菲爾德在一場慕尼黑的演講結束後，被毆打到差點致死。在此同時，巴伐利亞的幽默作家路德維希·托馬斯(Ludwig Thomas)也不斷地在《米斯田公報》(Miesbacher Anzeiger)上激怒赫希菲爾德，最後一次是刊於一九二一年的八月二日：

雞姦倡導者，胡說八道專家赫希菲爾德，將於九月在柏林召開豬會議……這個老加利西亞(Galician)王八蛋逼迫大眾接受雞姦，好像這麼做是為了大家好。……這個卑鄙的傢伙原本想在慕尼黑散布他的骯髒宣傳，但



一些突如其來的精準反擊卻將這隻王八蛋豬逼回他在柏林的豬圈咕嚕亂叫去。這隻死豬再也不會在此出現了，因為他知道下一次他的豬頭可能會被打爛。

污衊赫希菲爾德，指他為猶太人的不限於右翼分子或民族主義團體。在一九二〇年代，尖銳的反猶太聲音還來自他自己的陣營，來自組織化的同志權利運動。例如，創辦《自主》(Der Eigene)的阿道夫·布朗德(Adolf Brand)即有意無意地與他保持距離。布朗德曾在他的另一本號稱是《自主》的「嘲弄和攻擊」版書刊《安姨》(Die Tante)中刊載了一篇由德國醫生也是納粹黨員的卡爾·萊因特·亥姆柔特(Karl-Günter Heimsoth)所寫，名為〈朋友之愛或同性戀〉(Love Between Friends Homosexuality)的文章，文中盡是對赫希菲爾德的惡意攻擊。亥姆柔特後來因為與衝鋒隊指揮官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過從甚密而聲名狼藉。布朗德在同一本書刊中載印一幅只可能已經在納粹報紙《衝鋒隊員》(Der

Stürmer)出現過的赫希菲爾德諷刺漫畫。

在納粹掌權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日報仍視赫希菲爾德為仇寇，即便他過世許久後亦然。許多宣傳工具，就連德國衛生博物館這種機關內的資料也以赫希菲爾德做為猶太人的典型代表。

赫希菲爾德之所以會承認自己的傳統，都是被納粹逼迫的。剛開始他只是防禦性地承認。漢斯·布呂爾(Hans Blüher)記錄了一段應該是赫希菲爾德跟他說的話：

「現在我必須抗議被叫做猶太人，並且因而受到那些納粹豬的排擠和壓迫。我是一個德國人，一個德國公民，就和興登堡(Hindenburg)或魯登道夫(Ludendorff)這些人一般好，也和俾斯麥或我們的老皇帝是一樣的，是一個誠實的德國人，是一對德國父母在德國所生的！我生而為猶太人，像全歐洲所有的猶太新生兒一樣：他們被迫接受宗教的束縛，受洗或行割禮，並注定與父母同樣的信仰。因為我的父母信仰猶太教，我就得烙印上猶太的標記！」

當然，這裡面的遣辭用語更像布呂爾而非赫希菲爾德的口氣，不過它們所要表達的肯定是赫希菲爾德自身的立場。過沒多久，他便在自己的紀錄中寫道：

「抵制猶太日——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將會持續下去，但這不會是猶太歷史中僅有的一次！最近，對猶太人的羞辱和貶低已經隨著時間越演越烈，情況有如在美國的黑人。身為猶太後代的自由愛好者，我感到在德國生活除非情非得已，已經變得完全不可能。我已經有了打算，我不想再見到德國，我的祖國，雖然這樣會帶給我極大的感情傷害。」

到頭來他還是無法解決那些強加諸在他身上的問題：「你屬於哪裡？你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折磨著我。如果我把問題限縮成：『你是一個德國人——一個猶太人——或是一個世界公民呢？』我的答案永遠都是「世界公民」抑或「三者皆是。」

撇開赫希菲爾德個人對隸屬某個宗教團體和拒絕信教的看法不談，某些理論學家引用猶太哲學家黑爾曼·柯亨（Hermann Cohen）所持的觀點，嘗試在一個猶

太價值所貫穿的哲學傳統中找出赫希菲爾德性學觀點的定位。此舉或可證明「赫希菲爾德所抱持的『歷史是實現自由的遺跡』這種概念，深受彌賽亞預言式傳統中的公平氛圍所影響。」他對兩極性別的解構「也不脫由彌賽亞所啟發的解放史概念之框架，但它卻超越了衍生出它的原神學世界觀。」

## 與社會民主黨的關係

根據赫希菲爾德自己的敘述，他在念大學時遇見奧古斯特·倍倍爾<sup>22</sup>並且透過他接觸到社會民主黨。也因為這份情誼，倍倍爾於一八九八年不顧大部分社民黨員的反對，將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的請願帶進國會。

除此之外，赫希菲爾德可能沒有參與過政黨的其他政治活動。德意志帝國國家警察，甚至未將赫希菲爾德列入涉嫌參與社民黨活動的醫師名單裡。總之，赫

希菲爾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曾為此政黨競選活動站台演講過。同一時期他還接受社民黨衛生政策專家朱利烏斯(Julius Moses)的委託，為提議籌組的衛生部擬了一份有關責任與義務的草案。這份以「保健系統國家化」為標題的文件發表於一九一九年，文中可以看出赫希菲爾德所面臨的兩難：黨內左翼勢力所期待的保健系統國家化將不利於他這種執業醫師。身為一個成功的醫療企業家，他拒絕為綜合醫院規劃與組織醫生。

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社民黨(SPD)和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中許多與赫希菲爾德年齡相仿，並且曾在政府或國會任職過的年長工人領袖，受邀參訪性學研究所。透過這種方式，赫希菲爾德希望他的性改革議題能夠獲得政治上的支持。他的盟友庫爾特·希勒公開建議社民黨提名赫希菲爾德為國會議員候選人，但社民黨並沒有接受他的建議。

就像許多在研究所的工作伙伴一樣，多年來赫希菲爾德都是由一群左傾醫師所組成的跨黨派「社會主義醫師聯盟」中的活躍會員。他曾經多次受邀演講，可

是他的研究所對這些聯盟同事而言似乎過於創新了。

## 深受文學的熏陶

儘管赫希菲爾德放棄了現代語言學而轉念醫學，但他仍持續強化他在文學方面的興趣和接觸。當赫希菲爾德還在慕尼黑就讀時，曾替挪威劇作家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朗讀來賺取外快，並與劇作家法蘭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的作家弟弟都納德·魏德金(Donald Wedekind)結交。定居柏林之後，他，還有他的妹妹弗蘭奇絲，便時常和哈特兄弟身邊的狐群狗黨往來。就如小說兼劇作家卡赫曼·卡斯騰(Hermann Kesten)後來所嘲諷的：

在世紀更替之際，朱利烏斯和海恩里希·哈特<sup>23</sup>這對自然主義兄弟便與古

斯塔夫·藍道爾<sup>24</sup>、評論家費利克斯·霍連德(Felix Holländer)一同創立了為實踐「真實生活的新秩序」的「新社團」，他們在烏蘭德路上擁有一間共有的公寓，由激進的莎士比亞評論家古斯塔夫·藍道爾和無政府主義者耶里希·米薩姆(Erich Mühsam)負責準備三餐，馬丁·布伯<sup>25</sup>與赫希菲爾德負責籌畫各種以宗教和性為主題的演講，而作家沛塔·希爾(Peter Hillé)則是大聲朗讀他的詩作。

世紀更替後，赫希菲爾德仍時常由妹妹陪同，定期拜訪在威爾海姆哈根的作家聚落。他更與那裡的威爾海姆·博許<sup>26</sup>一同到一所由博許創設，專辦成人教育的自由大學工作。

赫希菲爾德也和艾爾瑟·拉斯克-許勒<sup>27</sup>相交多年，她不僅寫了一首詩獻給他，夏天還經常到位於科爾貝格，先是由赫希菲爾德姊妹艾格尼絲，後來交給珍妮經營的民宿度假。在年輕一輩的作家中，克勞斯·曼(Klaus Mann)尤其想和赫

希菲爾德結識交往。至於在一九二八年出版小說《阿爾富》(Alf)而一舉成名的布魯諾·福格爾(Bruno Vogel)，則曾經是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的員工。

赫希菲爾德的寫作風格，比起科學論文，更受到一些文學典範的影響，他特別重視「讓大家都看得懂」。他許多付印的文章都是從演講稿中發展出來的。赫希菲爾德明知作品的品質可議，卻還是將自己的一些試作詩拿出來出版。在他所編輯的《家庭醫師》雜誌中也屢見他加進去的一些慶典詩作。赫希菲爾德還將一篇報導他到義大利旅行——循著約翰·約阿希姆·溫克爾曼<sup>28</sup>、詩人奧古斯特·馮·普拉滕(August von Platen)和卡爾·海恩里希·烏爾利希斯<sup>29</sup>等人的足跡——標題為〈在遠方的三個德國人墳墓〉(Drei deutsche Gräber im fernen Land)的詩作登在一九〇九年的《性的中間性年鑑》裡。

## 所提倡的運動與科學研究組織

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第一個為同志爭取權利的組織

赫希菲爾德並不滿足於做一個僅就疼痛提供醫療協助的醫生。在他之前，他的父親除了行醫之外將家鄉開發為附設水療館的海邊度假休憩區，並為《波美拉尼亞科爾貝格報》撰寫星期專欄來累積自己的政治實力。小赫希菲爾德遵循著父親的腳步從自然療法服務做起。然而此時他的畢生志業已悄然浮現。

關鍵契機是發生在馬德堡，根據赫希菲爾德後來的描述，就在那裡他和同性戀結下了醫學與科學上的不解之緣。有一位年輕的軍官病患，如父母所擔心害怕的，在結婚前夕舉槍自盡了。他在寫給醫生的遺書當中，透露了自己之所以結束生命的原因，並且質問赫希菲爾德（那時他還未滿三十歲）該如何教育周遭那些對同志的命運和未來不懷好意的人們。至少赫希菲爾德在他的第一本主題小

冊子《莎芙與蘇格拉底，或女女和男男之間的愛對那些性向正常者來說是什麼》（*Sappho und Sokrates, oder wie erklärt sich die Liebe der Frauen und Männer zu Personen des eigenen Geschlechts*）裡是這麼說的。他聽從發行人的建議，以假名拉米恩（Th. Ramien）出版了這本冊子，不過這個名字之後再也沒有使用過。

六個月後，於一八九七年，赫希菲爾德在夏洛滕堡的公寓內，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友人，也就是他的萊比錫發行人馬克斯·施波爾（Max Spohr）、漢諾瓦鐵路局員工愛德華·奧博格（Eduard Oberg）、作家法蘭茲·約瑟夫·馮·畢洛（Franz Josef von Bülow）等人一起創設了「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直到一九二九年為止他都是該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算是第一個為倡導同志權利而創設成功的組織。先期的一些組織，如卡爾·亨利希·烏爾利克斯在一八六〇年代的嘗試，不是以失敗告終就是功能不彰。

委員會的主要活動為請願廢止一八七一年所訂定生效的德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它明訂男同性戀是一種犯罪行為。自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二〇年代，請願一

再被提至國會卻一再失敗，這份請願書不啻為德國同志權利運動的創始文件。不斷加長的連署名單活像是一份德國社會的名人錄。赫希菲爾德和他的盟友早期鎖定醫生、律師、藝術家、老師和教授，並且獲得相當多的同意簽署，但這其間也遇到過強烈反對的人士。

當成員人數高達七百人時，委員會除了請願活動外，還應大家的要求開辦了一項性教育計畫。它主要的內容除了辦理演講之外，還出版了一本因大量印製而成本低廉，名為《第三性該知道些什麼呢？》（*Was soll das Volk vom Dritten Geschlecht wissen?*）的小冊子。有些同志會要求將它送給親友，當作告白的工具。它在各種活動場合中發放，或進一步地被故意遺留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上。因此在二十世紀更替時，同性戀儼然已是第四個禁忌話題，排在花柳病、賣淫和避孕／節育之後，並引起更多人的關注。

委員會在招募成員時，以相當傳統的方式直接向各個職業工會和受教育的大眾招手，他們在包括醫學出版物在內的專業期刊或書刊上刊登論文。這十分符合

赫希菲爾德的最高準則——「科學是通往公平之路」。

一開始他只是想知道在各種不同團體，如鋼鐵工人、科技大學學生中的同性戀比率。問卷一寄出旋即惹來極端保守的學生代表和一些教會團體的惡意中傷。他甚至試著證明同性戀只是一種人類性戀的自然變形，因此確立它和異性戀一樣，皆是人類的性戀。他引用了當時最先進且可資證明的醫學知識和論點來支持這個結論。他先是引用基因研究的研究結果，看似合理地來證明同性戀者的必然性和不變性。後來則將荷爾蒙研究（內分泌學）的發現擺前頭。因為某些具有特殊功能的荷爾蒙作祟，造成人類中出現同性戀或異性戀者，甚或兼具兩者之人。這些論據的戰略目標全都為了證明「自然性」，而赫希菲爾德更透過這「自然性」的邏輯推論得出刑法的制裁是荒謬的。

一位明智的委員會成員班聶迪克特·弗里德廉德（Benedict Friedlaender）道出了團體中存在的戰略差異：「我們相信……我們不需要一個絕對有效的理論……就我們最根本的議題，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而論，我們只需純粹地以法律和道德

的論據力爭即可。「他認為赫希菲爾德的「性的中間性」學說讓同志成了「自然界的  
精神怪胎」、「可憐的半女人」，以及「受困在男性軀殼內的可悲女性靈魂」。他  
認為這是一種「乞求性的理論」，可能可以激起同情和容忍，但不會贏得尊敬或法  
律之前的平等。

當某樁醜聞涉及到在義大利卡普里島自殺的工業家弗里德里希·阿爾弗雷  
德·克魯伯(Friedrich Alfred Krupp)，或是帝國諮詢顧問菲利普·歐伊倫堡伯爵<sup>30</sup>  
(Philip Count Eulenburg)和他的友人，而引起大眾注意時，委員會試著透過這類  
事件獲取他們的利益。一些期待「出櫃」的成員力勸將高層的同志名單曝光。他  
們認為單這麼做就足以拿掉刑法上有關同性戀的條文。

赫希菲爾德一向反對這種「踩著別人屍體」的路線，因此受到他人的指控，  
說他對同性戀成因的辯護不夠明確。他也在與奧倫堡醜聞有關的審判中犯了一  
個戰略上的嚴重錯誤，在未曾親自替當事人作測試、檢驗的情況下，就以「無  
意識」同性戀的辯詞幫柏林軍事指揮官庫諾·馮·毛奇(Kuno von Moltke)作證。

赫希菲爾德被迫在二審時修改他的「專家意見」。

赫希菲爾德的信譽未能從那次的災難中完全恢復過來。這個在事件發生前備  
受尊敬且聲譽蒸蒸日上委員會，從此失去大部分的成員和支持者。赫希菲爾德  
的不明智之舉和非醫學行為也造成了他與亞伯·摩爾公開失和。摩爾在事件發生  
前已是一個被公認的同性戀醫學專家，但礙於赫希菲爾德突出的公眾形象，一直  
感覺到自己被忽視了。雖然赫希菲爾德認為自己的所做所為全是為了爭取更大的  
利益，卻也不得不令人質疑他做為醫生和科學家該有的嚴謹性。

另一個衝突則源自於委員會與支持者之間的等級問題。男同志的公眾形象是  
以與他連結的一些形容術語來決定的，如「嬌貴的」、「有女人氣的」、甚至是「穿  
女裝的」等等。總之，許多同志，包括許多委員會成員在內，都無法接受以「內  
妳皇后」(nelly queen)或「阿姨」(auntie)做為原型或正面角色楷模。這些同志們  
認為自己是「貨真價實的男人」，並且和「娘娘腔類型」保持距離。於是他們倡導  
不會觸及地位和性的朋友之愛，以及他們和古希臘人都能理解的師生之愛。

赫希菲爾德對此一笑置之，他在討論耶里希·米薩姆所出的小冊子中提到：「不管如何，友誼，如耶里希·米薩姆所形容的，一旦晉升為情慾之愛就不再是友誼，而是愛了，只因為它晉升為情慾之愛便如此。」

就是這個衝突，導致赫希菲爾德在隔年依據某同性戀理論將「異裝癖者」(Transvestit)——為他所創的專有名詞——從同性戀族群中區分出來(在此之前「同性戀」只是一個不分類別的統稱)，並單獨為他們設立一個不同的類別。

赫希菲爾德在奧倫堡醜聞災難過後出了國門，行經荷蘭、英國、土耳其等地，並且專心致力於實體科學研究和出版計畫。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被迫重新界定它的目的。出版記錄同志真實生活的《勒索和它的受害者》(Aus der Erpresserpraxis)，以及透過社會事件促進團結成為委員會的重要課題。但戮力於刑法方面的改革仍是委員會最迫切的任務。就在將女同性戀納入刑法處罰範圍的修法提議於一九一一年被提出後，委員會便開始加強與德國婦運激進派的合作。

赫希菲爾德先前曾和「保護母親與性改革聯盟」的領導者海倫·斯托克(Helene

Stöcker)有過接觸，如今他們的接觸再次強化，後來更深化為終生的友誼。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委員會無法隨心所欲地寄送愛心包裹給他們在前線的會員。赫希菲爾德當時在柏林附近的露勒本紅十字軍隊當醫生。他常以專家的身分接受諮詢，被問及同志是否適合擔任戰鬥任務，抑或要到什麼時候人們才會理解為何擔任間諜的男人在行刑時身著女裝等等問題。赫希菲爾德在戰爭初期以演講內容為藍本，發行了極具民族色彩的兩本小冊子：《為何其他國家會憎恨我們?》(Warum hassen uns die Völker?)和《戰爭心理學》(Kriegspsychologisches)。可是當他真正面對了戰爭的可怕，並受到斯托克與希勒等人的影響後，旋即就加入主張和平的「新祖國聯盟」，成為該聯盟的成員之一。

在戰爭結束且共和國成立之後，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發現它有了新的競爭者。除了先前已經存在，以布朗德為首的菁英主義的「自主社團」之外，還有許多「友誼聯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德國各地。這些聯盟很快地便一起加入在威瑪共和末期就宣稱擁有五萬名成員的「人權聯盟」。其成員主要都是聯盟主席弗



里德里希·拉茲茨懷特(Friedrich Radszweit)發行的雜誌訂戶。就在「人權聯盟」吸收許多地方團體的同時，委員會仍固守在柏林，儘管其間曾有一些較小團體存在於萊比錫、慕尼黑、法蘭克福和漢堡等地。而赫希菲爾德在同志權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也不再同戰前一樣牢不可破。

委員會逐漸被整合到新成立的性學研究所內，成為它的性教育部門。在此同時它仍尋求與其他組織的結盟合作。隨著共和體制的出現，刑法改革似乎已經近在咫尺。但這個希望的火花和進展很快地便因聯合政權的瓦解而破滅。除了一些個人因素牽扯其中外，彼此間水火不容的領導權爭奪，再加上戰略和目標上的差異都是導致結盟失敗的原因。於是赫希菲爾德排除了競爭團體「自主社團」和「人權聯盟」，而與其他盟友另外創設了「適用性侵法律的改革組織聯合」，此舉令那些沒有被納入的組織深感遺憾。

赫希菲爾德、希勒和林塞特另行嘗試了一種赫氏早在科學研究上就採用的擴大戰線策略；其中包括同志所要求的較大範圍的性規定改革——改革婚姻法和離

婚法，改革現行管理墮胎、淫媒、賣淫和色情書刊的法條。他因而尋求與婦女運動、主張節育的民間團體、婚姻法改革者以及其他類似組織的密切合作。

一九二七年，該聯合組織在有關刑法改革方面提出了一個令人矚目的替代方案。不過它所涵蓋的法律原則直到西德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間的刑法改革之前，從沒有履行過。

廢除第一百七十五條的目標在一九二九年的夏天差點達成。國會中的刑法委員會，包括主席那一票，都建議刪除這部分的條文。(年滿二十一歲之)成年男性間的「單純」同性戀因此不再是起訴的對象。在此同時，所謂「適格的」犯罪也有了新的定義，這意味著同性戀行為不但有法可罰，甚至比之前的罰則更為嚴厲，同性戀賣淫尤其如此。

這項改革從未明訂成法律，因為國會又再次遭到解散。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在面臨國會準備審議刑法之際，也對該採取何種策略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多數的意見認為應該將那些「不受懷疑」的專家名單，透過中間人提交給委員會主

席。對於這樣的決定，赫希菲爾德頗不以為然，於是他將這份寫在印有德文SEX（即英文SHC）信箋上的名單直接寄給委員會主席。他的專斷引來了一次「總清算」。此時，林塞特這位和社會民主黨完全劃清界限的德國共產黨（KPD）官員，整理出一份洋洋灑灑的揭發內容，在其中列舉了赫希菲爾德過去和現在所犯下的所有不當行為。

時至今日，這一事件的真實性已不可考。然而赫希菲爾德倒真的諮詢過他的律師瓦特·尼曼（Walter Niemann），想就這份揭發採取法律行動，他也因此辭去了主席職位，委員會同時搬出了性學研究所。委員會改投到新主席，亦即赫希菲爾德多年好友歐托·尤利烏斯伯格（Otto Juliusburger）的旗下，後來由海恩里希·司塔貝爾（Heinrich Stabel）接續領導，但它充其量只是前身的一道影子，影響力已遠遠不及。

### 科學期刊與協會——同志權利運動最重要的德文資料來源

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在創設兩年後決定出版期刊，並在一八九九年指派赫希菲爾德擔任《性的中間性年鑑》的編輯。直到一九二三年為止，委員會總共出版了二十三冊年鑑（其中的二十二冊由萊比錫的馬克斯·施波爾發行）。至今這些年鑑仍是研究同志歷史和同性戀權利運動最重要的德文資料來源。然而年鑑本身僅是實踐「科學是通往公平之路」策略的傳播工具。赫希菲爾德亟欲將同性戀議題完全納入當時逐漸成型的性學研究領域。

一九〇八年，他在科學人道委員會的支持下，創辦了該領域的第一份專業刊物《性學期刊》（*Zeitschrif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共同編輯的還有維也納民族學家弗里德里希·克勞司（Friedrich S. Krauss）和萊比錫婦科醫生赫爾曼·羅德（Hermann Rohleder）。這本期刊僅維持了一年，爾後便併入由婦科醫生馬克斯·馬庫斯（Max Marcuse）主導，截至一九一五年仍發行的刊物《性的問題》

(Sexualproblems)。

一九〇八年，赫希菲爾德與尤利烏斯伯格、海恩里希·柯爾巴(Heinrich Körber)、卡爾·亞伯拉罕<sup>31</sup>、伊凡·布洛赫(Iwan Bloch)一起成為了「柏林心理分析協會」的創始會員。尤利烏斯伯格和柯爾巴同時也是SHC的活躍會員。赫希菲爾德與心理分析的「私通」並沒有維持太久。他在一九一一年和它分道揚鑣，因為他認為心理分析學家並不認同他所堅信的「同性戀是天生」的觀點，他們只想從個人的心理發展過程裡找出它的成因。

赫希菲爾德繼續尋求在科學界的盟友。所以我們能夠在一九一三年成立的第一個性學專業組織——「性學醫生學會」的創始人名單中找到赫希菲爾德的名字。學會存在期間，和其他團體一樣，也發生過內部衝突和自我定位的改變，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加諸在名稱上的各種字眼看出端倪：性學與優生學醫學會，……與優生基因學……與遺傳研究……與性政策。學會也發行一本同樣名為《性學期刊》的刊物，由亞伯特·優楞伯格(Albert Eulenburg)和伊凡·布洛赫負責編輯。

歷史不斷地重演。這本期刊的命運亦然，它在發行人的決定之下，於一九一九到二〇年間賣給了競爭對象，一群以馬庫斯與摩爾為首的醫生們。赫希菲爾德因此被發行人拋棄了。而且性學醫生學會在一九二〇年代最後幾年間的會員資格與研究重點經常變動，赫希菲爾德因此僅罕見地在一場論壇發表過他的一些研究結果。藉此機會，赫希菲爾德將性學研究所作了組織化的轉型，並以自己的一些科學立論做為它的研究主流。

### 性改革世界聯盟——提倡同志除罪化與社會公平議題

赫希菲爾德一直想要將「同性戀刑事訴訟」這個特別議題，融入一個完整的社會與性政策框架之內，他最後創設的「性改革世界聯盟」就是為了要和這個計畫作無縫接軌。雖然性改革世界聯盟到了一九二八年才正式在哥本哈根完成登記，但其實早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間它就已經開始運作了。

世界聯盟曾因舉辦四場大規模會議<sup>32</sup>而聲名大噪，這些會議基本上是仿效他於一九二二年在研究所舉辦的「以科學為基礎之性改革國際會議」。會議中所發表的演講集也透露出它左右為難的窘境：相對聚焦於優生節育、墮胎起訴和性教育的諮詢服務議題，對赫希菲爾德個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同志相關法律」和「社會公平議題」逐漸被邊緣化了。最後，在赫希菲爾德過世之後，由於中產階級和秉持社會主義的性改革者之間的想法產生矛盾，導致該組織於一九三五年宣布解散。原本計畫要在莫斯科、巴黎和芝加哥等地舉辦的會議也因而胎死腹中。

### 性學研究所——替性學建構一個組織化架構

鑑於德國當時的大學不可能開新的性學科目，除了一些期刊與專業組織外，能替性學建構一個組織化框架的重責就落在了赫希菲爾德身上。於是他在一九一九年用自己的錢在柏林創設了性學研究所。不過他之所以會這麼做，並非出於完

全無私的奉獻之心。在帝國時期，要贏得「醫療諮詢顧問」的頭銜就和獲取「經濟諮詢顧問」是一樣的，必須對公眾利益有特殊的建樹（一些德國王子會以販售頭銜的方式來充實他們的國庫）。

一九一八年，赫希菲爾德在公開宣告自己打算成立基金會之後，又歷經了一番波折才終於取得他夢寐以求的頭銜。儘管它實際上並非由皇帝簽署，卻仍獲得公眾的認可，也有助於提升與中上階層人士日常交往時的地位。

基金會花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才取得正式的認可。獲得初步的許可是在一九一八年底，後來又於一九一九年二月獲得第二次的批准。研究所終於在一九一九年七月正式揭幕。一九一八年，赫希菲爾德買下了貝多芬大街三號轉角的在略爾藤街十號，一棟剛好位在動物園附近的宏偉建築。這棟名為「哈茨費爾德宮」(Hatzfeld Palace)的建築，原本是為小提琴家約瑟夫·姚阿辛(Joseph Joachim)建造的。但實際賣家並非哈茨費爾德王子，而是伊森堡伯爵。赫希菲爾德早就在附近居住並執業：先是在略爾藤街十九號，接著在十六號。研究所開始運作後不

久，由於業務需要又買下了附近緊鄰皇宮在略爾藤街九號<sup>a</sup>的房子。

#### 員工

研究所或許為一人所主導，但赫希菲爾德卻不可能事必躬親，特別是他的些計畫還需要將許多不同的專業領域納入。這些專業領域除了醫學外，也涵蓋了生物學、心理學、精神病學、民族學（包括民俗學）和人類學。研究、教學和醫療照顧是研究所的三大核心業務。

教學部分除了替將來要成為醫生、律師、老師、居家服務護士和警官的學生，設計一套學院級的專業進修課程外，也替一般普羅大眾開設演講、課程、夜間諮詢、電影課程和刊物發行等廣泛的一些教育課程。多年以來，雖然教學重點屢次隨著開課時請到什麼樣的員工而變動，但性政策和性改革始終是研究所永久不變的終極教學任務。

我們無法在這裡一一列出所有曾在研究所短期或長期工作過的人員名單。也

由於納粹對研究所摧毀得非常徹底，造成了我們在資訊上的取得存有一些斷層。不是所有的名單都被保存了下來，許多相關資料遺失了，研究所員工的排班或編組情況也無從得知。常出現的就是一些莫名的照片。

在研究所中與赫希菲爾德共事過的重要醫療人員，依照他們加入研究所的時間排序計有：

1919-1926：阿瑟·克隆菲爾德(Dr. Arthur Kronfeld)，醫學及哲學雙博士、精神病學兼心理學家。

1920-1922：阿瑟·懷爾(Dr. Arthur Weil)，醫學及獸醫學雙博士、神經內分泌學兼神經病理學家。

1922-1933：伯恩哈德·夏皮柔博士(Dr. Bernhard Schapiro)，醫學博士、皮膚學兼內分泌學家。

1922-1924：弗里登塔爾博士(Dr. Friedenthal)，醫學博士、人類學家。

1926-1933：路德維希·拉維-連茲博士(Dr. Ludwig Levy-Lenz，醫學博士、婦科醫生。

1926-1929：馬克斯·侯丹博士(Dr. Max Hodann)，醫學博士、性教育家。

1928-1933：費利克斯·亞伯拉罕博士(Dr. Felix Abraham)，醫學博士、精神病學家。

短期共事者則有弗里德里希·威爾特海姆<sup>33</sup>、奧古斯特·貝頌格<sup>34</sup>、醫療諮詢顧問歐伊根·里洵爾<sup>35</sup>、漢斯·格拉茲<sup>36</sup>、法蘭茲·普朗格<sup>37</sup>、約翰內斯/漢斯·克萊斯邁亞<sup>38</sup>以及貝恩特·戈茲<sup>39</sup>。

赫希菲爾德甚至邀請民族學家費迪南·馮·賴岑施泰因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Reitzenstein)來幫忙。馮·賴岑施泰因先前曾在「德勒斯登國際衛生博覽會」工作過，爾後以民族學作家的身分自由撰稿。赫希菲爾德將他引進親自主編的研究所雜誌《性與社會》(Geschlecht und Gesellschaft)，及其增刊《性改革》

(Sexualreform)的編輯群。剛開始時，因為缺乏空間，馮·賴岑施泰因並不能如願地從德勒斯登搬進研究所。等到預備留給他住的在略爾藤街九號a建築內的房間空下來時，他卻中風了，並且從此一病不起。

一開始，研究所負責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性改革及性政策業務的部門，歸委員會秘書格奧爾格·普洛克(Georg Plock)所管轄，希勒曾稱他是「一位有前科的前牧師」。自一九二三年起則由理查·林塞特接管，並由他的朋友裴塔·里曼(Peter Limann)從旁協助。當SHC在一九二九年搬出委員會之後，性改革及性政策的業務便交由一位因違反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被判刑且被解除職務的前普魯士公務人員威廉·考夫曼(Wilhelm Kauffmann)來掌管。考夫曼還兼任性改革世界聯盟辦公室主管，但這個職位除了一些必要的外交工作外並無其他事可做。

在研究所內負責一般行政和設備維護的員工，包括有赫希菲爾德的親信兼多年行政主管的弗里德里希·豪普特施泰因；阿瑟·勒瑟(Arthur Röser)、圖書管理員；赫希菲爾德的朋友和終身伴侶卡爾·吉斯，檔案主管；耶瓦爾德·勞

許(Ewald Lausch)、醫療助理；各種管理人(很多都是夫妻檔)；弗里德里希斯小姐，廚師；阿得爾海德·雷恩哈克管家；安轟·迪爾(Aenne Diehl)、家庭幫傭；埃蓮娜·黑琳，接待員；弗蘭茲·維瑪，赫希菲爾德的私人隨扈；還有小說家克里斯多夫·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在他的回憶錄《克里斯多夫和他的同類》(Christopher and His Kind)中提到的埃爾溫·漢森(Erwin Hansen)則任雜役。

研究所偶爾會雇用一些臨時雇員，供SHC的一些辦公室使用或作為赫希菲爾德的祕書。這些人包括有布魯諾·福格爾和袁因特·瑪耶達(Günther Maeder)。至於管家，偶爾會以暫時借居於研究所的人、沒有錢付房租或醫療費用的人暫代。被稱為多爾席恩(Dorchen)的魯道夫(Rudolf R.)或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其他如一九五〇年代在東德小有名氣的畫家阿諾／托尼·耶貝爾(Anno/Toni Ebel)，也曾住過研究所的地下室長達一年之久。

## 企劃

剛開始的前幾年，研究所主要是作為學術研究和訓練的場所。醫生員工為學生辦理專題研討會，並且做自己的研究，在科學書刊上發表研究成果。在整個過程中，阿瑟·懷爾的研究特別引人注意。

為了要證明赫希菲爾德的「無論男或女同志都有一些可供測量的身體特性，而其測量值就介於男與女異性戀者兩測量值之間」理論，他做了一系列的同志身體特性研究。

阿瑟·克隆菲爾德完成了他的《性精神病學》(Sexualpsychopathologie)著作，並以性的基本型態問題和性失調的精神治療選擇為題發表了無數的論文。赫希菲爾德則發行了他的《性學》(Geschlechtskunde)著作的前幾章，它到了一九三〇年時已增為一本共五冊的套書。

研究所的次要業務便是治療病患。

戰爭過後的前幾年大多以性病病患為主。淋病與梅毒在當時非常普遍，也不像現在這麼容易治療。後來，其他問題才日形重要。舉伯爾哈德·斯伽皮爾柔為例，他就經常治療因內分泌失調而引起身體不適的男女病患。

勃起障礙也成了前往研究所尋求醫治的另一個病因。無論男女，想要透過手術改變他（她）們的生理性別的也找上了研究所。這些所謂的變性手術案例曾刊載在醫學文獻當中。

研究所排名第三的業務主要是諮詢和教育。

除了演講和小冊子外，赫希菲爾德與他的員工還使用教學影片。其中最為著名的《與眾不同》(*Anders als die Andern*, 1919)只剩一小片段保存下來。

避孕、節育的工具和方法是一再重複的主題，直到最後，研究所甚至開辦了兩週一次的「問題之夜」，專門提供這方面的資訊，並且大受歡迎。研究所圖書館開放給有興趣的一般大眾，而它的珍藏品展示活動也成了威瑪共和時期在柏林的旅遊盛事。

一九二〇年代末，性學研究所員工還可以透過兩本雜誌和一般大眾對話：其為瑪利阿·克力什(Maria Krische)主編，針對性教育的《啟蒙》，以及由拉維·連茲主編的《婚姻》(*Die Ehe*)。

### 著名場所

研究所所有五間位於閣樓的客／病房。此外，赫希菲爾德的姊姊瑞查·托比阿斯也在她的公寓裡租了幾間房。在許多被提及曾短暫住過性學研究所的人當中計有作家華特·班雅明<sup>40</sup>、克里斯多夫·伊舍伍<sup>41</sup>、培塔·馬丁·藍貝爾<sup>42</sup>和路德維希·雷恩<sup>43</sup>；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sup>44</sup>；舞蹈家安尼塔·貝爾芭<sup>45</sup>；和「假王子」哈利·多梅拉(Harry Donela)。

德國共產黨(KPD)新聞部官員及國會議員威利·繆其伯格(Willi Münzenberg)與他的終生伴侶巴貝特·格洛斯(Babette Gross)一起，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三年間一直住在在略爾藤街九號a的一間公寓，這棟建築不但可直通研究所，它的



走道更藏有研究所的部分珍藏品。也由於在略爾藤街九號a可直通研究所，所以他這間公寓非常適合做為與一些同謀者開會使用；誰會注意到有哪個造訪者在導遊中穿過哪幾扇門呢？

一九二〇年代，性學研究所成為柏林的一個旅遊景點。

曾經造訪者的名單很長，長到想要在這裡做部分的呈現都顯困難，但有一些非提不可的名字，例如：

達達主義藝術家第爾·布魯格曼<sup>46</sup>、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sup>47</sup>和雷奈·克雷維<sup>48</sup>、伊舍伍的朋友威斯坦·休·奧登<sup>49</sup>、後來以筆名恩斯特·耶里希·諾特(Ernst Erich Noth)聞名於世的泡爾·克朗茨<sup>50</sup>、畫家克里斯其安·夏德<sup>51</sup>、電影製作人及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sup>52</sup>和電影製作人伊沃·蒙塔古<sup>53</sup>。

作家西婭·施特恩海姆<sup>54</sup>在日記中曾提到她的幾個比利時友人是如何引誘她前去造訪研究所的。有人甚至還在那裡見到了年紀的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sup>55</sup>呢。

## 赫希菲爾德的晚年

### 世界巡迴演講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五日，赫希菲爾德從布萊梅港出發，搭上哥倫布號，隻身前往美國作巡迴演講。吉斯留守柏林。赫希菲爾德回到歐洲後曾寫了一份詳盡又生動的報告，敘述他在旅途中的種種經驗和冒險，但對於剛到美國的前四個月則僅約略帶過。

這份報告《一個性探索者的世界之行》(Die Weltreise eines Sexualforschers)的英文版《男男女女：一個性學家的世界之行》(Men and Women: The World Journey of a Sexologist)於一九三三年在瑞士面世。

前幾個邀請是紐約的醫學家哈利·班傑明和芝加哥的馬克斯·托瑞克(Max Thorek)安排的。不過顯然這只是起頭而已。一九三〇年的聖誕夜，赫希菲爾在

大西洋城記載道：「紐約或許只是個開始，是一次世界巡迴演講的第一章，因為我打算經由芝加哥和加州，然後前往東京、上海，到那些可能邀請或已經邀請我前去演講的地方。至於何時會回到德國，則全視我所受的待遇和一些其他的因素。」

前往美國中西部以前，赫希菲爾德在紐約停留了六個星期，他在那裡會見作家、藝術家、醫生和科學家，在哈林區、澡堂和夜間法庭做田野調查。他造訪芝加哥和底特律，拜訪住在密爾瓦基、威斯康辛的親戚，並順道到尼加拉瓜瀑布一遊。加州是赫希菲爾德在美國的第三演講地，他先在舊金山作了幾場演說，然後前往夏威夷、帕薩迪納、聖地牙哥，甚而遠至墨西哥旅行。

起初赫希菲爾德是以德文演講的，但他的英文隨著旅途的腳步，顯然慢慢進步到可以公開與他人對談的程度。作家喬治·西爾維斯特·維埃瑞克<sup>56</sup>對他所做的長篇專訪刊登在美國報紙上。維埃瑞克後來因公開支持納粹而揚名於美國。因為亞伯特·愛因斯坦剛造訪過加州，他便突發奇想，以「性學界的愛因斯坦」

這個稱謂來引介，當時在美國還默默無聞的赫希菲爾德。而赫希菲爾德也曾去過巴莎迪那市探望愛因斯坦一次。

赫希菲爾德在橫跨美國的旅途中決定不直接返回歐洲，他接受了日本和中國的演講邀約，由舊金山出發，行經夏威夷前往東京。因為他拖著患有糖尿病的病體，所以紐約和芝加哥的朋友一再警告他，怕他承受不了如此勞累奔波的旅途，但赫希菲爾德不是一個聽話的病人，他作了這樣的記載：

芝加哥的醫生們，特別是梭瑞克醫生(Dr. Thorek)，他害得我緊張兮兮，不斷地告誡我「不要去東方」，威脅說如果不好好照顧自己的話，會導致「糖尿病昏迷」、壞疽等等我應該感到害怕的病症。

誠然……：旅途當中，無論是在餐廳、旅館、餐車，或我受邀的私人家中，還有船上，要控制飲食會比在家裡要來得困難許多。另一項事實是，發癢有時變得相當嚴重，想抓卻又怕感染。

他有自己獨到的認知：

主觀來說，此趟旅行我感覺非常好，確實比過去幾年在歐洲時還要好。我那疼痛且因神經發炎的左手臂已經完全痊癒。令我非常困擾的牙痛似乎不再有了。

我之所以感覺疲倦，全因為活動量超過該有的自然比率，無論是相對於我正常的活動量或是就我的年齡（再加上內心的不安因素）該有的活動量而言都超過了。我所有的免疫系統近期內完全沒問題。很難想像我已經是一個死亡的候選人（我並不比別人更有資格）。最起碼，目前我還不應該認為自己是一個有生命的廢人。

他需要新經驗的挑戰，而且他需要那些德國不再擁有的聽眾，如果還有的話，也敵不過日趨險惡的環境：

當然除了德國的環境因素之外還有其他原因。例如，在經過辛苦的一年，寫完《性學研究》之後，對於「創造性休整」的渴望。再者，運動的明顯消退……對研究所的一連串失望、滿意的支援員工難找……再加上那些支持我的同事間時有的摩擦……

就是想一個人出去走走，從沒考慮到會發生什麼事。此外，那時的心情也沒有考慮我現在理解到的：「世界才是我的舞台」——不侷限於歐洲，更不侷限在德國。

赫希菲爾德於一九三一年帶著這種樂觀的心情行經日本，然後駐留在上海。他總共在中國停留了六個星期。他在上海遇見了李兆通（李道），一個年僅二十四歲的醫學院學生。

他以赫希菲爾德的學生兼同伴的身分陪同赫希菲爾德繼續他的旅行，經由菲

律賓和印尼到新加坡、錫蘭、印度、埃及和巴勒斯坦，然後再回到歐洲。一九三一年十月初，身在印度巴特那的赫希菲爾德記載：

我在旅途當中最大的收穫之一就是李道（兆通），一個有教養的年輕中國人，他在最後的五個月一直陪伴著我。他的高貴氣質，他的聰穎，他的忠貞和全心的奉獻令這趟旅行輕鬆了許多，實在太棒了。他的願望，也是他爸爸的，就是到德國修習醫學和性學。我認為他就是我夢寐以求的學生，一個可以塑造成我的模樣的學生。

赫希菲爾德賦予了李兆通律師的權力，萬一他在旅途中過世，李兆通可以處理他的財產和手稿，也會帶著他的骨灰回到柏林，並在研究所停留直到一切就緒。

旅途的緊張，尤其是熱帶的濕熱氣候，終於讓他付出了代價。一九三一年十

至十一月間，赫希菲爾德因為罹患瘧疾而臥床盪盪。「我必須視它為不幸中的大幸，在一個瘟疫和霍亂橫行的地區，我竟然只得到瘧疾（高燒至華氏一〇五度）。」而瘧疾的再發使得赫希菲爾德不得不放棄原本在埃及的所有演講。他的一九三一年聖誕節，就如同前一年在美國時一樣，是在海邊度過的。「我好想看看聖誕樹，於是就帶著李道一起到『巴伐利亞啤酒屋』，一家位於亞歷山卓的水手吧。」巴勒斯坦深深地吸引著赫希菲爾德，那裡是他這趟非歐洲之旅的最後且重要的停留之所。相對於聖經的歷史遺跡，赫希菲爾德對那些在吉布茨（Kibbutzim）集體農場裡體驗集體生活的年輕人印象更為深刻。而他也懷疑能找出一種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來與阿拉伯人和平相處。

赫希菲爾德認為這次的旅行是一趟「性—民族學」的研究之旅。許多別人送給他或沿途取得的物品都被他運回了性學研究所，其中包括一根得自印尼，重達百磅的石頭陰莖。

他在於一九三三年發行的《一個性探索者的世界之行》引言中，試著為這趟

旅行作總結：「世上沒有任何兩個國家或民族的性習俗是相同的。」這些差異並不是來自任何性屬性的不同，因為性屬性的不同只存在於個人之間，在各民族之間並無不同。性習俗的多樣性全然取決於多樣的性表達方式。

赫希菲爾德堅信，各種不同的習俗都有其真實的來源，直到較晚階段，我們回溯起來才替它們創造出象徵性和理想化的解釋。因為每一個民族和每一種宗教都傾向視自己的習俗為客觀且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戒律，但到目前為止仍不可能替人類各式各樣的性和愛的習俗，找出一個非常貼切，且又能與性生物學和性社會學的研究結果相吻合的解釋。「赫希菲爾德認為性民族學的課題」只是一門對於人類與性的客觀科學之研究，可以替人類性權利的圓滿實現鋪路。」

### 流亡與過世

赫希菲爾德並沒有能夠帶著這趟旅行的收穫回到他的研究所。他在印度時接

獲來自柏林的警告，並開始懷疑回去是否明智。一次緊急的流亡在一九三一年秋天算得上稀疏平常。儘管環境不友善，此時的他離生命和身體的威脅尚遠，而研究所也還繼續營業著。納粹尚未完全掌權。

當赫希菲爾德抵達雅典時，歐洲的爭端找上了他。他寫道：

三月十七日（一九三二年），我前腳剛踏上歐洲的土地，後腳騷擾就接踵而至；就連在我登陸的所在地雅典，（從德國進口）報紙上立即謊話連篇；到了維也納，情況更加惡劣；至於德國本土，則是威脅信和傳單（「我們會好好地招待他」、「他已經玩完了」）滿天飛。當然，我並不缺少好伙伴（愛因斯坦）！

這使得我的處境，我回家與否，似乎要比想像的來得可怕……我以為活在一群視我為「外國人」的人當中實在有失尊嚴。我，一個曾為德國寫過那麼多德文

著作的人。如果德國不要我，我也不要它了。

雖然滯留在外令赫希菲爾德非常難過，但他還是明智地選擇不再踏入祖先的土地一步。就在赫希菲爾德留置維也納的時候，李兆通獨自前往柏林，並參訪了他那位亦師亦友的伙伴之前的事業。

一九三二年對赫希菲爾德而言，可說是馬不停蹄的一年。一些疾病不停地找上他——他為瘧疾、糖尿病和會不時發作又折騰人的多重神經炎所苦。赫希菲爾德還多次心臟病發作，害他以為死期將近。他和他的內科醫生老友利奧波德·科尼希(Leopold Honig)一起到卡爾斯巴德和瑪琳巴德<sup>57</sup>去作水療，但抒解效果並不大。

在馬不停蹄的來回奔波當中，赫希菲爾德除了心繫著《一個性探索者的世界之行》的手稿寫作，和世界性改革聯盟在布爾諾會議的準備工作外，還擔心性學研究所是否能倖存，並且繼續進行它的工作。來自柏林的朋友和來自研究所的同事在布爾諾會議開議前與會議期間，陸續前往捷克拜訪他，赫希菲爾德甚至試圖

安排年輕的新研究所內科醫師約瑟夫·懷司寇普夫(Dr. Josef Weisskopf)參與會議。

一九三二年底，人在蘇黎世的赫希菲爾德警覺到一生的心血可能面臨大規模的摧毀而岌岌可危。因為在該年夏天，普魯士納粹政府已經打算撤消研究所的贊助者——「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博士基金會」這個非營利組織的法律地位。這是他們動作的好時機，因為每年必須提出的年度計畫和財政報表不是根本沒做就是不完備。赫希菲爾德只好承認，他的資深行政主管豪普特施泰不再是「我建造房子的基石」。

儘管研究所有了財務危機，但直至四月為止，它似乎還能夠執行它的醫療業務。就在夏皮柔寄來幾封擊劃未來的信件時，赫希菲爾德已經搬到了阿斯科納。夏皮柔在信中提及他續留研究所的可能性，他說如果任命一位新的「亞利安」醫療主管的話就可能留下來。但這項提議並未實現。

一九三三年的五月六日，研究所遭到一批納粹體育系學生的掠奪。部分藏書

於五月十日被丟到歌劇廣場上的火堆中焚毀，燒掉的還包括一尊被串在棍子上的赫希菲爾德半身像。幾天過後，赫希菲爾德面臨護照即將過期，卻不敢貿然前往蘇黎世德國領事館申請延期的窘境。於是他偕同吉斯和李兆通一起離開了阿斯科納。赫希菲爾德接著在史特拉斯堡度過了她的六十五歲生日，然後再在巴黎尋求庇護。「法國人對我很友好，對流亡者很友善。」赫希菲爾德在一家巴黎戲院看到了有關焚書的新聞影片。

納粹律師胡勾·維克博士(Dr. Hugo Vieck)被派去接管柏林研究所。他以不堪的字眼辱罵那些留下來的員工，並要赫氏的老友瑪嘎瑞特·多斯特(Margarete Dost)出面替赫希菲爾德買回屬於他個人的圖書和收藏，不然便全部予以銷毀。至於剩下的部分則在一九三三年的十一月十四日公開拍賣。赫希菲爾德在他的遺記上寫下：

今天，十一月十四日，自我踏出離開柏林的不歸路已經三年了。今天，

在我過去的家中，開始拍賣我留下來的書籍、醫療器具、家具——那是(到目前為止)由精神虐待所構築出來的最後一幕命運悲劇。連我的姊姊在內的每一個人都被逐出了房子。律師公會占領了研究所。我的權利完全被剝奪，迫害與羞辱一股腦兒地往我頭上砸了過來。

赫希菲爾德確實從研究所內搶救出一些器材，不是由自己就是假他人之手(例如，曾遭到驅逐並於一九四三年被殺的布爾諾律師卡爾·懷恩(Karl Fein)買回。赫希菲爾德也企圖利用這些殘留的器材在巴黎開辦新的性學研究所。為了這件事，他需要哥哥伊曼努耶爾的朋友兼同事，亦即來自上阿爾薩斯(Upper Alsace)的醫生埃德蒙·贊巴特(Dr. Edmond Zammer)的協助。因為贊巴特擁有一張赫希菲爾德所沒有的，可以在法國行醫的法國醫師執照。

吉斯也於一九三三年的十二月從布爾諾搬來法國，他被納入新研究所的計畫當中，預計需要他來整理殘留的檔案。但吉斯卻在一九三四年的夏末遭到逮捕，

爾後被驅逐出境——「因為涉及了一樁澡堂的意外事件」，希勒於事後寫道。經過一番努力，赫希菲爾德終於將德國那批器具儲放進貝德爾與蔻的家具儲藏倉庫。他還在索邦神學院舉辦了一次講座，赫希菲爾德認為那是他停留在法國期間最風光的一刻，爾後他便與李兆通一起前往尼斯，那個地方對他來說不僅是曾經避寒的舊地，也有過一段美好的海邊回憶。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他在尼斯租下了一間公寓。

如果凡事都能如自己所願的話，我希望我的晚年能在這裡或尼斯附近（只要是沿著里維耶拉海岸線都可以）安度。我的健康情況很差……以我這把年紀來說實在不該再懷有任何遠大的抱負了。在這裡，我擁有一些好朋友<sup>58</sup>，以及足夠的日常生活刺激，最重要的是，這裡的海和陽光可說是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興奮劑。

如果能在這些條件下再多活個十年（或許可以活到看見希特勒幽靈消失的

那一天），如果可能的話，再來幾次的旅行：那我就真的別無所求了。而我的經濟情況也是允許的。

他未能活著見到「希特勒幽靈」消失，但他卻躲過了後來降臨在法國南部那批德國移民身上的悲慘命運。赫希菲爾德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四日，就在他六十七歲生日的當天中午，在他與侄孫恩斯特·馬斯（Ernst Maass）、羅貝爾特·基爾希貝爾格（Robert Kirchberger）一起讀完所有好心人寄來的信件之後便與世長辭了。這時的李兆通正開始他在蘇黎世的學業；而吉斯則在維也納。

赫希菲爾德早已寫好遺言：「有關我的葬禮，我希望：火化——在孟德爾頌和舒伯特的樂聲中——不需要任何神職人員的禱詞——朋友的弔唁等等。」不過他的願望並沒有完全實現。儘管遺體如他所願，沒有遵照猶太的習俗予以火化，但還是有一位猶太祭司在他的葬禮中念了禱詞。

赫希菲爾德葬在尼斯的蔻凱德公墓。墳墓上豎著一個簡單的直立式墓碑，上



有阿諾德·扎迪寇(Arnold Zadikow)創作的赫希菲爾德側面頭像。扎迪寇和赫希菲爾德同樣來自科爾貝格，而赫希菲爾德之所以在遺囑裡指定他來委製墓碑也是出於一片好心，藉此幫助這位遭到驅逐且收入無著的藝術家。

## 第二章

### 赫希菲爾德的性學 與優生學研究

## 「性的中間性」學說

赫希菲爾德的名字和「中間性」(sexual intermediacy)這個概念緊緊地綁在一起，這是他經觀察後得到的一個概述。赫希菲爾德不希望他的觀察意見被理解成「中間性理論」(Theory of Sexual Intermediacy)。一個可以用來解釋某些現象的科學理論。相反地，中間性學說被認為只是一種詳述，一種「分類的原則」，一種嘗試，用以說明各種現象，並讓這些現象能在一個有秩序的系統中被理解。

「性的中間性學說」的基本想法是，所有人類的特徵無論是從身體上或心理上，都被分為男性與女性兩種型態——或有一些陰陽人的特例。為了讓人更清楚地理解這種差異，赫希菲爾德將這些特徵分成四大類型：

——性器官；

——其他身體特徵；

——性慾(性傾向)；

——其他心理特徵；

人類的屬性裡所謂男性與女性的界定，其實是以無數種的混合和比例變化存在於這四大類型之中。小說裡具百分之百男性特徵的全然男性或全然女性，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在威廉二世統治下的德國，男性女性的角色界定要比現在嚴格許多，如上述這樣的「性融合」(dissolution of the sexes)說法在當時一定會被認為是沒事找事，甚至是丟臉的。

即便如此，赫希菲爾德對於「男性」或「女性」的性向特徵定義，基本上是不脫他那個時代的說法的。對他而言，男性的特性是積極、富創造性、好冒險的……。而女性的特性則是被動、多愁善感、期盼的……。這樣的分類並未涉及任何具有優劣意義的主從關係。反之，兩方的這些特性皆同樣有效且同等重要。

在上述四大「性的中間性」主要特徵類型中的每一類型，都有男性與女性特

點的混合特別突出的人，他們會被列舉出來，作為各個「性的中間性」類型的典  
型例子。

### 性器官的「性的中間性」

這種類型包括所有那些性器官不能清楚地被辨別為男或女的人，抑或同時具有兩性性特徵者。「雌雄同體」與「陰陽人」指的就是這個「性的中間性」類型。透過與華沙教授法蘭茲·路德維格·馮·諾伊鮑爾<sup>2</sup>的密切合作，赫希菲爾德審視並診察過許多這類型的人。但赫希菲爾德所能做的也只是盡量幫助這些人解決日常生活中碰到的種種困難。當德國民法在一九〇〇年後生效，這些天生擁有曖昧性器官的人所受到的待遇，比起先前適用於普魯士臨時法時還差。

新的德國民法規定，發現上述情況，須由醫生或助產士來決定此類新生兒的性別，爾後永生適用。但在一九〇〇年以前，這樣的決定則只是臨時的。直至該

關係人年滿十八歲，他或她仍有權決定他（她）們往後所想要的性別。赫希菲爾德一向認為只要牽涉到關係人自身的生活，最終的自我裁量才真正符合人性，他一再要求將德國民法修回先前的規定，但並未能成功。儘管這條法律本身沒有任何曖昧的地方，但赫希菲爾德卻點出，現實是曖昧的。

### 其他身體特徵的「性的中間性」

這是一群具有各種不同身體異象的族群：最為常見的是女人長鬍子或男人有胸部。任何身體的標準尺寸或比率都可拿來作為這方面的研究判斷：身體的強度、特別高或特別矮、肩膀或臀部的寬厚、牙齒的長度。種種這些往往被拿來作為屬男或屬女的證明，但它們也極有可能處於中間的階段。

## 性慾的「性的中間性」

對赫希菲爾德來說，這個類型中主要有兩個群組：同性戀與性轉向現象（metatropism）。他的第一個概念至今仍被普遍使用，故無須再多加贅述，但後者就屬於是赫希菲爾德自創的新詞，不僅在他的時代不為人所接受，至今也早被遺忘殆盡。赫希菲爾德創造它的用意為何？無非是想以它來取代在當時已普遍使用的「虐待狂」與「被虐待狂」兩個詞。更確切地說，他試圖將其所意指之經驗與行為模式納入他的「男性」和「女性」的概念之中。

就他的理解，支配慾與權力慾在性關係中是屬於男性的；而服從性與苦中作樂則是屬於女性。以這個概念的邏輯推演得出，如用現代詞彙加以說明，就是一個具有虐待傾向的男性只是將他的男性氣概發揮到極致，而一個相對有積極支配慾的女性虐待狂則是一種性轉向現象。反之亦然，一個女性被虐待狂只是一種十

足的女性表現，而男性被虐待狂就是一種性轉向現象。

赫希菲爾德的研究重心一直都聚焦於同性戀上面，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可以清楚知道性的中間性概念主要是用來解釋同性戀。赫希菲爾德和他的同事努力想找出同志的一些特點。他（她）們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種性傾向的中間型，即所謂的「中間性的典型例子」。這些研究者開始從筆跡，轉而從體態，甚至擴大到個人的四肢長度尺寸去找出它的中間性。他們引用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的「體型學」概念，結果發現關於同志的某種生物法則，他（她）們的個別特徵，追究起來是特殊荷爾蒙分泌濃度的作用。

## 其他心理特徵的「性的中間性」

這種類型也是包含各種不同特點的聚集。例如，赫希菲爾德認為筆跡及肢體動作，或許連臉部的表情都是男性、女性或男女性混合體的一種外在表徵。還有

他（她）們毫不在乎外在因素的穿衣習慣，如在職場不穿工作服，也被視為是一種中間心理的表徵。男性和女性異裝癖就屬這種類型。在當時，「異裝癖」這個詞彙不單指那些喜歡奇裝異服的人，還用來指稱自認為是異性，且一直想要藉由外科手術來改變他（她）們原本生物性外觀的人。我們現在另稱這些人為變性者或跨性別者。

同樣地，異裝癖尤其是變性者，他們所面對的日常法律困境，亟待赫希菲爾德幫忙尋求解決之道。雖然法律並沒有禁止公然穿著異性服裝，但卻可能以「行為不當」或「擾亂公共秩序」的罪名予以起訴。赫希菲爾德和他的律師朋友成功地說服了警方，至少是柏林地區的警察，發放「異裝癖許可證」給這群人。那是一張簡單用打字機打出的身分證，上面貼有照片並加蓋官防，用來證實攜帶此卡者有穿著異性服裝的習慣。

誠然，眾多的「性的中間性」族群，可能在四大類型的各種組合中顯露出男性和女性的特徵。不過就個人而言，總有一方，亦即男性或女性的特徵會取得優

勢。

赫希菲爾德之所以想要發展出一套科學的性別分類系統，有其政治解放上的考量。既然連所謂的正常人也同樣是「性的中間性類型」的話，那麼排斥同性戀、異裝癖，或其他種種就失去了它的邏輯性。透過這個概念，我們無須解釋為何某個人會是「這個樣子」而不是「那個樣子」的。

用來闡述「性的中間性」概念的描述分類法，並沒有說明這些不同的表現形式和行為出自何方，亦沒有解釋它們的成因。赫希菲爾德相信天生擁有，一些遺傳屬性決定了個人的「天性」。社會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替這樣的天性找到它最適當的位子，讓它得以充分發展，並使得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能「順著他或她自己的天性」好好地生活。有些東西是「天生的」，所以也是「自然的」或「自然的變異」的，這些東西絕非靠個人主動的意志鍛鍊就能掌控，也因此不能稱它是「不合倫常」或「不道德」的，更不能施加犯罪性的懲罰。赫希菲爾德想透過這個「性—政治」的論述獲取一些論證，做為廢止德國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有關同性戀條文之用。

正當這個概念醞釀的那一年，荷爾蒙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的方式，不僅可以用來解釋一些性的傾向與行為，還能說明一些特有的身體特點。自從維也納荷爾蒙研究者歐伊根·斯坦恩阿赫(Eugen Steinach)成功地將異性生殖腺體植入老鼠和天竺鼠的體內，因而轉變它們的性行為模式後，赫希菲爾德便堅信自己的同性戀生物學解釋即將成立。他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從男同志的睪丸和女同志的卵巢裡找到證據，證明它們與異性戀者器官所產生的荷爾蒙是不一樣的。

不幸地，循著這條思考軌跡，赫希菲爾德在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參與了一些殘忍的實驗。想要治療特殊性癖好的男同志們接二連三地被移植入異性戀者的睪丸。雖然有些病患如預期的，在做完手術並且復原之後，認為自己已經有了異性戀的需求。

但是不久後卻證明移植的睪丸組織不能存活下來製造荷爾蒙。反之它會萎縮甚至壞死，最後不得不加以移除。最終的結果就是睪丸外部或全部都得切除，明顯造成病患生理和心理的不良後果。這種「治療」同性戀的方式約莫在一九二四

年左右被斷定不足以採信。

赫希菲爾德顯然並沒有察覺，他認為「同性戀是自然且無須治療」的概念與上述人體實驗是衝突的，這點頗令人訝異。至少，他未曾提過這一點。事實上一些動這類手術的病患原本就屬於是自殺的高危險群，他們認為這種「治療」是自已最後、最佳的希望。

身為醫生的赫希菲爾德不能也不願讓他們失望。試問如果這個實驗成功的話，那麼赫希菲爾德和他的奮鬥伙伴，要替男女同志爭取公平權利的努力將會演變成什麼樣呢？一個對同志不友善的社會環境肯定會立法強制他(她)們接受變性或矯正治療。

### 提出「適應治療」療程的概念

赫希菲爾德事實上已經開發出一套更可能滿足自己的政治渴望，且對同志

(和其他性的中間性者)更有幫助的同性戀治療概念。令人驚訝地，他僅兩度向他的醫界同事提及這個概念：一次於一九一四年，埋藏在他的大部頭著作《男與女同性戀》的文字當中(於一九二〇年再版)，而另外一次則出現在為一九二七年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心理治療會議所準備的演講本裡面。這樣的療程以今日的眼光看來顯然是稀鬆平常，但要赫希菲爾德時代的醫生作這樣的診療是危險的。

簡而言之，他發明了自助團體或它的原型。赫希菲爾德以「適應治療」或「心理環境治療」的標題來形容他的療程。醫生必須在療程中先判定前來尋求諮詢的同志是否有任何器官上的疾病，接著測試他或她的綜合心理狀態。如果檢測顯示沒有特別疾病存在，有也只是因患者本身，或他(她)所處的社會環境排斥同性戀所引起的毛病，那麼醫生就應該告誡病患，「同性戀」不是病，所以不能也不用治療。醫生應該鼓勵病患強化他或她的自我肯定，並與病患討論如何規劃日常及性生活才不會與法律有所抵觸。

在赫希菲爾德的時代，這樣的討論對醫生來說會碰到一個難題，他們不能單純地建議違法性行為，尤其是在一個處處充滿著被敲詐勒索危險的年代裡。因此，他們必須私下討論什麼樣的性行為不受法律保障(肛交與口交是會被處罰的)，以及要如何避人耳目地與另一個同志約會，以免遭到敲詐。

赫希菲爾德認為這樣的討論非常有用，在這個階段，如果醫生能讓病患多接觸一些「智慧較高的同路人」，則可以免除病患的社會孤立感，並且有機會瞭解「像他或她一樣的同道們」的生活和行為方式。

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給了赫希菲爾德建立這種團體的機會，而性學研究所也確實提供其他性的中間性者一些諮詢服務，並告知他們諸如異裝癖及變性者的團體和集會。

## 優生教育

直到十九世紀末，生物學和醫學上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就是，我們的身體和心理屬性如何傳遞給下一代，以及我們如何去影響這些遺傳特點。有關遺傳規律性知識的進步帶來了希望，有目標地應用遺傳學或許可以改進一些個人的特點，至少可以終止它們據稱是避免不了的惡化現象。「退化」在那個年代是一個可怕的字眼。它源自於精神病學，卻很快地成為人口政治學的警語。而赫希菲爾德也認同：「一個人的基因品質……會受到正面或負面外在行為的影響。」

赫希菲爾德對於哪些行為會有所影響感到興趣。例如，酒精會造成生殖細胞的損壞，所以人們應該戒酒，而酒精成癮者也不該再生育下一代。將受損或「劣等」的基因傳遞下去會危害大眾健康，各項調查報告在在顯示，帶有據傳為「劣等」基因組成者的生育頻率高過那些帶有「好」基因者，而且整個國家將會面臨逐漸退化與悲慘命運的威脅。

赫希菲爾德也想在這種科學論述中尋求同性戀的「自然」定位。同志本身不是病了或退化了，這或許只是自然界為了避免傳遞受損的下一代而要的一種「詭計」。每當討論到同志應否結婚時，他會一再地重申這個論證。赫希菲爾德試圖以這個具有社會效用的論證來獲取人們對他的政治要求的支持。然而這樣的論證並沒有產生特別的扭轉效果，因為同志們依舊被打入劣等類。

在赫希菲爾德的時代，生育不僅被視為是個人的權利也是對其所屬國家的一種社會責任。這個責任不單指生育，還包括產生健康的後代子孫在內，生育出來的下一代不僅不能造成團體的負擔，也要成為社會有用的一分子。爭論點在是它該如何達成，是透過政府的強制執行，還是尊重個人的選擇呢？為了讓國家對生育有所控制，各種可能的辦法都被拿出來討論：

——適婚證明（必備或自願的？）；

——做為預防和／或懲罰的絕育或去勢；



——諮詢機構的資訊與教育（是否發放避孕用具？）

赫希菲爾德相信教育的力量。如果人們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對個人及社會有利的，他們就會遵循。在一九一九至二〇年間，於「帝國衛生會議」的公聽會上，赫氏代表「性學與優生學醫學協會」參與了有關適婚證明的討論。赫希菲爾德站在反對人民有義務需取得健康證明的一方，但也全力支持婚姻雙方自願性的資訊交換。這也是他要在性學研究所附設一個婚姻諮詢中心的原因。諮詢中心又名母子優生諮詢，由與裸體運動關係密切的漢斯·格拉茲主持。有關這間德國類似機構中維持最久的諮詢中心，它的相關紀錄並未保存下來。

赫希菲爾德背離了「知情同意」的基本準則，認為對那些因精神障礙——當時用詞為「精神上……是笨的」——而沒有能力行使同意權的人，以及戀童罪犯者強迫實施絕育或去勢是明智的處理方式。在這些個案中，「治療」並非赫希菲爾德的首要考量，社會的維護才是需要優先處理的。公共衛生可以透過優生措施予以

改善的這個信念，在當時的左派醫師中非常盛行。即便在納粹頒布了遺傳健康法（其實是用來對付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種族」與政治異議分子的）之後，赫希菲爾德依舊認為優生學原則是可信的。

第三章

對同志運動的啟發  
與留下的資產

赫希菲爾德過世的時候，他的性學研究所已經不復存在，科學人道委員也告解散，至於世界性改革聯盟的主席諾曼·海爾(Norman Haire)和喬納森·額格·馮·諾因巴赫(Jonathan Hoegh von Leunbach)則因為政治立場相左，不可能也不願意再一起共事。至此再也沒有任何機構可以將赫氏的科學遺產或社會改革遺願繼續傳承下去。流亡的處境，加上連番戰事也令人失去繼續從事赫氏工作的意願。

## 他的學生卡爾·吉斯和李兆通

赫希菲爾德在晚年的時候留有兩位可以託付畢生心血的學生：一位是曾經與他同住性學研究所的卡爾·吉斯，另一位則是和他一起旅行的香港人李兆通。他把保有的收藏品、版稅收入和剩下來的現金都留給了他們兩位，條件是這些遺

產不能用在他們自己身上，必須用來創設一間新的研究所，如果行不通的話，就用來遂行「我們的運動」。然而，兩位繼承人都沒有能夠完成他的遺願。

研究所毀掉之後，吉斯逃往捷克斯拉夫，艱苦地在布爾諾生活。一九三三年底的一段時間，他與赫希菲爾德、李兆通一同住在尼斯以及巴黎。被法國驅逐出境後，吉斯就暫居於維也納和布爾諾。他高中沒有畢業，因而不能參加職業訓練或念大學。按赫希菲爾德的規劃，他應該為他的學士學位做準備。但自從赫希菲爾德過世之後，這樣的準備對他來說，在經濟上(可能還有心理上)就變得不能。

一些世界聯盟的朋友，諾曼·海爾和艾倫·貝加德(Ellen Bakgard)都曾資助過他，直到誤以為他可以從遺產中取得唸書的錢之後才停止付款。雖然布爾諾的律師卡爾·懷恩這方極力爭取，吉斯還是沒能拿到赫希菲爾德遺產中原本要給他的物品和金錢。吉斯於一九三五年夏天寫給馬克斯·侯丹的英文信上提到：「一個內容物不詳的保險箱所屬的銀行，要求要有一份事實上只有德國大使館才

能發放的文件，但我們誰還敢去大使館呢？」我們無從得知吉斯隨後是否拿到，除一些私人紀念物除外，任何一部分的遺產。他於一九三八年在布爾諾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李兆通並沒有完成在蘇黎世始於一九三五年夏季學期的醫學學業，也未能完成後來改念的政治經濟學學業。在蘇黎世，他結識了英國作家羅伯特·希琴斯（Robert Hichens），希琴斯的小說《真相大白》（*That Which Is Hidden*）中的人物郭林（Kho Lin）就是以李兆通為藍本，而他與赫希菲爾德的關係則成為小說中的主軸。

李兆通於一九四〇年離開蘇黎世前往美國，他在哈佛就讀到一九四四年，然後進入華盛頓特區的中國大使館短暫地工作過。一九四五年，李回到了蘇黎世，先是修習醫學爾後轉念政治經濟學；在那裡，他同樣未得到任何學位。由於他來自一個富裕的家庭，所以不需要賺錢就有餘裕可以過生活。他於一九六〇年回到香港，再於一九七四年從香港移民到加拿大溫哥華，這個他的弟弟與其他幾位

家庭成員早已定居的城市。李兆通於一九九三年在溫哥華過世。除了私人紀念品外，他的遺物還包括曾經為赫希菲爾德所有，後來他一直保存在身邊的書籍，以及赫希菲爾德的旅行日記。

從極少數流傳到我們手中的李兆通手寫紀錄裡得知，很清楚，他認為接續赫希菲爾德的工作是身為赫氏學生的義務，但這個任務實在是非他能力所及。即便赫希菲爾德一再叮囑，李兆通卻未能完成有關赫希菲爾德教學的書籍以及他自己的旅行回憶錄。老實說，李兆通的部分遺產是由一位年輕的加拿大人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從歷史垃圾堆中救回來的，然後透過「柏林新猶太會堂基金會」的贊助才回到了柏林。

數年前，「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協會」在許多朋友的支持下，才又從李家取得李兆通從赫氏遺產中繼承到的那一批書籍。至於他遺產中的其他私人紀念物還是歸他在香港和溫哥華的家庭所有。

剩餘的赫希菲爾德遺產依然不見蹤影，其中包括了一些曾於一九三三年拍賣

會上賣出，而非由他自己買回的物品及器材。至於存放在貝德爾與蔻倉儲的物品，因為它的取貨憑單並沒有留下，細目無從得知。此外，他在尼斯部分的遺產，一開始就流落到一千未獲授權的人手裡，而這違背了赫希菲爾德的遺囑所言，必須先交由他的家庭處理。

最近，李兆通家族成員捐了一批信件和照片給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協會，它們現在保存在協會的檔案庫裡。總之有一套從昔日研究所流出的文件，雖其流傳路徑已不可考，但竟能找到布魯明頓印第安那大學的「金賽研究所」落腳，並以《赫希菲爾德的剪貼簿》(Hirschfeld Scrapbook)之名被保存在那裡。三不五時也會有來自研究所圖書館的零星書籍出現在二手和珍本書店裡。

近幾年，一些德國圖書館開始清查取得納粹時期及之後的圖書資料，但工作尚未完成。不過「柏林中央暨州立圖書館」已經發現一本來自前研究所的書籍，並將它贈與了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協會。

## 流亡者：侯丹、夏皮柔、希勒、懷爾

在那些曾經一同在研究所共事的人當中，內科醫生兼性教育者馬克斯·侯丹，試圖在流亡英國期間，部分出於想要確保自己的未來，建立了一間類似的研究所。他為了顧及英國的敏感神經及種種因素，費盡心力地避開任何和同性戀有關的連結，儘管侯丹付出極大的努力，但他的計畫並沒有成功。侯丹不得不在一九三五年底離開英國。

皮膚學兼內分泌學家伯恩哈德·夏皮柔在瑞士大學求學時已經拿到瑞士公民權，也因此能與他的家人避居蘇黎世。在那裡，以及隨後的美國、以色列，他重操以前在研究所做過的專門工作，但它的服務範圍僅侷限在自己的專業醫療上。

作家庫爾特·希勒在身為科學人道委員會的一分子時，曾和赫希菲爾德並肩從事運動，且擔任委員會的最後一任副主席，他也一樣，靠著流亡才躲過了浩劫。在倫敦，他嚴厲地批評過想於一九四〇年代末、五〇年代初在德國創設新的

類似研究所的企圖，它們果然很快地就以失敗收場。他也在瑞士的同志雜誌《圈》(Der Kreis)中，大力讚揚赫希菲爾德的貢獻。當希勒從倫敦返回漢堡後，他本著先前科學人道委員會的精神，草擬並發送了一份請願書。然而激進的開始並不保證通往成功。

阿瑟·懷爾已於一九二三年移民美國，並以神經病理學專家的身分在鄰近芝加哥的西北大學找到一份教職。一九五〇年代期間，他與開始在美國發展同志權利運動的一些成員有所聯繫，還曾旅外參加一九五四年在美茵河畔法蘭克福舉行的第一屆國際會議。我們無法得知他是否在會議中提出接續赫希菲爾德的方法。

## 德國境內的復興運動

在西德，於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經歷幾次失敗的組織重建後，關於赫希菲爾德

的記憶幾乎消失殆盡。

性學，在戰後重建成為一門學院學科，它先是引進精神病學的理論，但學術規模仍不脫納粹時期的樣貌。隨後又引用了美國傳進來的社會學方法，可是沒有人注意到阿爾弗雷德·金賽也曾用過赫希菲爾德在早期做的各種人口群中的同志比率調查研究。

德勒斯登(Dresden)的醫生魯道夫·克林瑪<sup>1</sup>恐怕是完全依據赫氏出版傳統的最後一位研究者，他在蘇聯占領區(後來的東德)動亂一結束後就急著效法赫希菲爾德，企圖影響法律的修訂。而他的著作《同性戀——生物與社會學的當代課題》<sup>2</sup>卻只能在西德發行(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五為止總共出了三版)。

慕尼黑的醫學歷史學家維爾納·萊布蘭德<sup>3</sup>在他駐留柏林的時候結識了赫希菲爾德，而安娜瑪麗·萊布蘭德<sup>4</sup>則是在一九六〇年代，為了要幫拉夫特·塞德爾(Ralf Seidel)尋找論文題目，才開始對赫希菲爾德有了興趣。後者在一九六九年的論文裡曾明確指出，赫希菲爾德的著作在當時的德國大學圖書館幾

乎遍尋不得。透過非學院系統，也只尋得被大事修改過的《世界大戰之性史》<sup>5</sup>的續編，以及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收集並由諾曼·海爾編輯的《性異常與性變態》<sup>6</sup>，其德文翻譯本被當成是情色文學，在德國貝阿特烏澤連鎖情趣商店架上販售多年。

一九六〇年代末，德國發動了第三波的同志權利運動，並再度勾起人們對先行者的興趣，多年的沉寂就此打開。自一九八二年以來，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協會已經有系統地蒐羅了一些對他的殘存記憶，並再度呈現在人們的面前。

時隔二十年，德國國會各政黨才勇於宣告納粹法律對同志的有罪判決是不公平的，並取消其原有之判決，而許多當事者早已不在人世了。

為了緬懷那些為同性戀作過犧牲的個人，為了研究同志歷史和他們的迫害經過，也為了研究赫希菲爾德的學術遺產和他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二〇一一年聯邦司法院從預算中編列了一千萬歐元，成立「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基金會」。自二〇一二年起，基金會便可以利用這筆捐贈基金所滋生的利息來支持反制歧視男

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者的研究和教育計畫。

後記

## 在北美洲的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

赫希菲爾德家族就和許多在波美拉尼亞（現屬波蘭）的家族一樣，都與美國有些歷史淵源。家族的一支於一九四〇年代移民伊利諾州。他們在紐約也有一些親戚，那裡是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第一次公開演講的地點，時間約莫落在一八九三年底或一八九四年初，而他的演講題目不是自然療法就是自然醫學。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的伯父愛德華在一八五〇年淘金潮時移民加州。他顯然在那裡發了財，因為他在一九五七年回程歐洲時搭的是頭等艙。不幸地，他所搭乘的船隻在南卡羅來納州外海沉沒，愛德華·赫希菲爾德因此罹難。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悼念他說：

赫爾曼·赫希菲爾德（馬格努斯的父親）有一位喜愛的哥哥愛德華，他天生聰穎卻放蕩不拘，多年以前就已經移民加州。他不僅帶著身體營養品，更帶精神營養品去給想要試試運氣之德國淘金客移民。他在參與建設的舊金山度過了多年成功且快樂的時光，然後他的思鄉病發作並渴望見母親一面。可是這艘名為「中美號」的船航行在大西洋時卻突然起火燃燒。據同行的乘客說，愛德華原本可以跟他們一樣自救，平安抵達附近的小島。但他卻認為必須先幫助其他的人，特別是婦女和已婚男人，登上救生艇，他因而喪失拯救自己的機會，隨著燃燒下沉的船一起沉到海底。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曾造訪北美兩次：第一次是在他剛拿到醫學學位，還是年輕小伙子的時候；第二次則是受到美國同事之邀，作演講之旅。根據他自己的敘述，他在一八九三至九四年間的旅費來自替報紙撰寫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的相關報導的酬勞，但我們無從得知當中他寫了哪幾篇的報導。這些文章有可能刊登



在他父親撰寫每週專欄的《波美拉尼亞科爾貝格報》。該報紙在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能保存下來的少之又少。

第一次到美國旅行的真正理由是為了拜訪他的哥哥伊曼努耶爾，後者在不久之前才升任為位於密爾瓦基的療養機構聖心療養院的主任醫師。它是一間由天主教聖若瑟方濟會修女經營，採用克奈浦(Kneipp)式自然療法的療養院。

一九〇〇年，伊曼努耶爾·赫希菲爾德與惠特克(W. R. Whitaker)在距離芝加哥北方十六英里的伊利諾州溫內特卡(Winnetka)，共同創設了「北海岸健康休閒中心」。它是一間針對上流階層開設的高級診所，是當時時尚的表徵。「北海岸健康休閒中心」相當於現今的「健康靜養中心」或類似機構。伊曼努耶爾·赫希菲爾德於一九一三年出版了一本有關健康生活，名為《心臟與血管：它們的保養與治療》(*The Heart and the Blood Vessel: Their Care and Cure*)的書籍。直到一九一六年為止它共發行了四版。

馬格努斯的二哥愛德華，在漢堡的藥房生意失敗後，也於二十世紀初前往美

國試運氣。但他在那裡的冒險並沒有成功，他於一九一〇年英年早逝。

深受赫希菲爾德喜愛的表妹阿格內絲·曼(Agnes Mann)則穿梭於新舊兩個世界，她在二十世紀初曾到伊利諾州埃文斯頓的西北大學修習牙醫，在布來梅和柏林執業多年後，於一九二〇年代再度回到那裡。她退休後遷往洛杉磯，在一九五八年過世。

赫希菲爾德還有一些遠房親戚為了逃避日益猖獗的德國法西斯主義而來到美國，例如他的侄孫恩斯特·馬斯，後來成為紐約聯合國的圖書館館員；以及他那一直到一九三八年都還在阿姆斯特丹著名的蜂巢百貨公司當執行長的姻親表兄弟李歐·邁亞，後來也定居洛杉磯。

赫希菲爾德第二次拜訪北美時正值他的事業高峰期，也就是一九三〇年底到三一年初的時候。這趟由紐約經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磯再到舊金山的演講之旅並沒有寫入《一個性探索者的世界之行》的書裡。我們僅能從保存下來的幾封信，其中幾頁曾轉載在德國報紙上，以及赫希菲爾德載在手寫日記式的《遺記：

筆記本二》中的簡短紀錄裡略知一二。

在紐約，赫希菲爾德除了醫學和心理分析兩個協會外，更數次蒞臨勞工會堂（Labor Temple）演講。德文的《紐約國民報》（*New Yorker Volkszeitung*）曾經對這些演講做深入的報導。赫希菲爾德與曼寧主教（Bishop Manning）的衝突害他吃上妨害治安行為的官司，也就是在那次的審判中他遇見了法官班·林賽<sup>1</sup>。

他與卡爾·凡·維克（Carl Van Vechten）喝下午茶的時候碰見了朗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和詹姆士·魏爾頓·強森（James Weldon Johnson）。他和著名的律師亞瑟·加菲·海斯（Arthur Garfield Hays）、克拉倫斯·蘇厄德·丹諾（Clarence Seward Darrow）談過話，並和安尼塔·盧斯（Anita Loos）一起去看了「色情電影」。赫希菲爾德多次被拍入新聞影片中。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了在大使館劇院<sup>2</sup>放映的新聞影片，其中的一段旁白為：「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性學研究所的創辦者，在論述他的理論……」可惜這影片已經遺失。

在美國，赫希菲爾德除了私人的會面外，還有一些職業上的接觸。

阿瑟·懷爾，這位早期性學研究所的成員，於一九二三年移民美國之前已在所內研究數年。他先到芝加哥，然後轉往紐約工作。

哈利·班傑明的一位朋友馬克斯·托瑞克也在芝加哥執業，他後來以「變性現象」的研究而聞名。

班傑明從一九二〇年代初期開始，就和赫希菲爾德以及性學研究所所有密切的聯繫，對於在那裡動的第一次變性手術知之甚詳。

醫生兼性學家威廉·羅賓森（William J. Robinson）曾經在柏林求學，並於一九二〇年代多次重返德國。他所寫的關於他拜訪性學研究所的報導被轉載成一篇文章。附錄。

赫希菲爾德與後來被指控為納粹臥底的喬治·西爾維斯特·維埃瑞克，在紐約有一段特殊——以現今的觀點來看相當擾人——的情誼。赫希菲爾德是喬治·西爾維斯特的父親，這位德國社會民主黨政治人物路易斯·維埃瑞克（Louis

Viereck)的朋友。赫希菲爾德一直跟他的家庭走得最近，但在他父親過世後，就和喬治特別好。他除了替赫希菲爾德的全美巡迴演講大肆宣傳外，還全程陪同。「性學界的愛因斯坦」這個稱號就是出自他的手筆。他已經在著作《偉人略影》(Glimpses of the Great)中作過赫希菲爾德的個人描述。但赫希菲爾德也不知不是真的瞎了眼，看不出喬治其實是贊同納粹的。赫希菲爾德在一九三三年寫給他的信上說道：

就我本身而言，我並不排斥你；因為我太瞭解你的心理了，我可以預見你根本抵擋不了希特勒的群眾煽動術。我深深以為，在你接到我寫給你的這封信，警告你不要相信那種虛幻謊言，及它可能帶給你和你的美國夢多大的危險……

我曾寫過一本名為《種族主義》(Racism)的小書，希望它能夠說服你……我並不相信這個世界如你所宣稱的，一定得經歷布爾什維克或法西斯階

段。相反地，我認為三個偉大的民主國家：法國、英國和美國迄今為止，尤其是在文化上，已證明民主才是堅實穩定的基石；做為一個世界公民，我們必須竭盡所能保住這個未來的希望。但你終究是你，你比較特別，一個既是德國人又是美國人的你。

赫希菲爾德所認識的美國人當中充斥著許多不同類型的人，其中包括婦權擁護兼無政府主義者艾瑪·高德曼(Emma Goldman)。本著對於生育控制的共同興趣，他去拜訪過當時在紐約的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他也曾數度見到她在柏林的代表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詹同志(Jan Gay)，原名海倫·萊特曼(Helen Reitman)，爾後以一位女同志激進分子而聞名，曾經以訪客的身分暫住性學研究所，她與在柏林、巴黎、倫敦和紐約的女同志訪談紀錄被喬治·亨利博士(Dr. George W. Henry)挪用，以他自己的名字發行出版。

艾爾莎·吉德洛(Elsa Gidlow)在她的自傳中提及拜訪研究所的經過。其他造訪者還包括蓋文·阿瑟(Gavin Arthur)——真實身分是切斯特·艾倫·阿瑟三世(Chester Alan Arthur III)、美國第二十一任總統的孫子，他後來在舊金山擔任占星家，阿瑟將同志和雙性戀者的生命軌跡納入了他的星相解讀中。他在著作《性的循環》(The Circle of Sex)中的一些想法和赫希菲爾德對性的中間性的描述極為類似。

美國早期的男同志組織者包括有在一九二四年籌組「芝加哥人權協會」(Society for Human Rights in Chicago)的亨利·格貝爾(Henry Gerber)，即使格貝爾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美軍的身分到過德國，因而熟知赫希菲爾德和科學人道委員會，但他仍受到阿道夫·布朗德組「自主協會」(Gemeinschaft der Eigenen)以及弗里德里希·拉茲茨懷特組「人權聯盟」的鼓舞。

不過赫希菲爾德是否於一九三〇至三一年間在紐約或芝加哥見過格貝爾就不得而知了。從他的《遺記：筆記本二》中得知，他在美國會見了許多男女同志，

且對他(她)們的次文化做過一番研究，但並沒有跡象顯示他曾參與過任何組織活動。

在他的旅程初期——紐約、紐瓦克、底特律和芝加哥——赫希菲爾德是以德文演講的。在往西岸的長途鐵道旅途中，他相當程度地改進了在學校所學的英文，好到可以在洛杉磯和舊金山以英文演講。赫希菲爾德在離開美國前往日本的途中經過檀香山時記載道：「單就演講而言，我特別高興的是，由於我埋頭苦練英文，現在(至少就理論上來說)聽得懂我的教學的可比以前多出了兩億五千萬人。」

我們發現美國媒體對於赫希菲爾德演講的報導有著顯著的差異，紐約的德文報紙會大量報導有關同性戀的演說內容，而從現在還尚能尋獲的有關三個月美國巡演期間的報導和訪談看來，幾乎全部聚焦在他所提出的科學化伴侶選擇及優生婚姻諮詢的建議，而不是尋找個人的終生愛侶。他的這些見解在某區域還被當作娛樂奇聞來報導。

赫希菲爾德也在一些訪談中，本著巡迴演講所得之經驗，對美國文化提出了諸多嚴厲的批判。作為一個性的研究者，他很不喜歡人們一談到性這個議題就擺出道貌岸然的模樣。

說到當時的禁酒令，那次的巡迴演講也使得他的態度有所改變。赫希菲爾德反對酒精，他在世紀交替之際曾撰文細數它的害處。但在美國實際體驗了禁酒令之後，他明白強制性的手段有時候只會適得其反。於是赫希菲爾德大聲疾呼，反對政府以嚴令禁止的方式來規範人民的健康或道德行為。

他對優生學也持同樣的看法。「優生學」是當時的隱語，講白了其實就是「改進我們的亞利安族系」。基於這個理由，赫希菲爾德特別想要瞭解在加州實施的，強迫精神病患和心智不全者絕育的實驗，以及拜會當時積極參與優生學運動的美國人。所以他會前往巴莎迪那市拜訪保羅·波普諾(Paul Popenoe)和埃茲拉·戈斯尼(Ezra S. Gosney)等人絕非偶然。

赫希菲爾德對於非裔美國人的生活條件也持批判的看法，但目前就我們所

知，他從沒有公開表達過。後來，一九三三年四月，他在《遺記：筆記本二》記載有關德國境內近期發展時，特別註明：「抵制猶太人的日子——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還會持續下去，不僅在猶太人的歷史上！最近，對猶太人的羞辱和貶低日趨嚴重，現在猶太人的處境也沒有比美國的黑人好多少了。」

當希特勒拿下德國政權之際，也就是赫希菲爾德尋找新家的時候。他有幾個選擇：跟學生兼生命伴侶李兆通一起到中國、留在法國，抑或接受邀請到美國另起爐灶。他後來決定留在法國南部。以六十七歲的年紀，他認為自己跟不上在美國重新過職業生活所需的快速步調和要求。

直到他早逝的一九三五年，赫希菲爾德從沒有後悔過這他的決定。納粹在他過世後不久謀殺了許多和他一樣流亡在法國的德國人，如果赫希菲爾德還活著的話也一定難逃魔爪。

一些原屬於赫希菲爾德所有的文件後來流落到了北美洲。「金賽性、性別與生殖研究中心」<sup>3</sup>所擁有的所謂《赫希菲爾德的剪貼簿》，就是阿爾弗雷德·金賽

從一位不知名的人士手中取得的。它主要包括由科學人道委員會在漢堡的成員卡爾·合夫特(Carl Hofer)所收集的一些文件。這些文件顯然已失掉了原有的排序，在它們從性學研究所被掠奪後，抑或在長途跋涉的途中已重新被編排過了。

李兆通保存了所有赫希菲爾德留給他的物品，即便旅行時也一直帶在身邊，一直保存到一九九三年他在英屬哥倫比亞省的溫哥華過世為止。溫哥華的亞當和南西·史密斯(Adam and Nancy Smith)拯救了一只皮箱，裡面裝的竟是遺產中的文件，他們於是在二〇〇三年把它贈與了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協會。協會隨後又從李兆通的家人手中取到好幾箱裝滿原屬於赫希菲爾德和李兆通的書籍。

赫希菲爾德的侄孫恩斯特·馬斯和他叔叔一樣，很年輕就離開了德國，赫希菲爾德過世的時候，他也在尼斯。馬斯從赫希菲爾德的遺物中拿了許多家族的文件、信件、照片，並帶著它們一起到巴勒斯坦，隨後又轉往了美國。他的兒子羅伯特·馬斯(Robert Maas)將所有的這些文件捐給了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協會。

透過一些北美洲研究者的協助，其他來源也被找了出來。在喬治·西爾維斯特·維埃瑞克的文件當中想必有許多來自赫希菲爾德和作家姊姊法蘭西斯卡·曼的信件。他的兩個哥哥伊曼努耶爾·赫希菲爾德(溫內特卡)以及愛德華·赫希菲爾德(芝加哥)的生活並未進行過探究。而表妹阿格內絲·曼和其他移民親戚的生活亦然。一路陪著赫希菲爾德穿越美國旅行的都是他們的兒孫輩。

## 註解

### 英文版引言

- 1 性的中間性：sexual intermediacy，性別不確定性、性別中間狀態。
- 2 哈利·班傑明：Harry Benjamin，美國內分泌學家、性學家。
- 3 多階性的中間性：sexual intermediate stages。
- 4 LGBTQ：Lesbian「女同性戀」、Gay「男同性戀」、Bisexual「雙性戀」、Transgender「跨性別」、Queer「酷兒」。
- 5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和性自由的追求：第一次國際性自由運動史》：Magnus Hirschfeld and the Quest for Sexual Freedom: A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exual Freedom Movement。

### 德文版引言

- 1 低頭豬：Rubenschwein，低頭覓食豬的原意指沒有證照而在菜園覓食的豬隻。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拿來形容那些為了躲避子彈而不敢將頭伸出壕溝的膽小士兵。一九二〇年代

更被用來形容一般膽小之徒。

- 2 科爾貝格：Kolberg，現今波蘭境內的科沃布熱格(Kolobrzeg, Poland)。
- 3 漢斯尤阿信·舒普斯：Hans-Joachim Schoeps，1909-1980，德國猶太宗教史學家和宗教哲學家。
- 4 庫爾特·希勒：Kurt Hiller，1885-1972，德國詩人、和平主義的新聞工作者。
- 5 布律恩：Brünn，現今捷克共和國布爾諾(Brno, Czech Republic)。
- 6 漢斯·吉斯：Hans Giese，1920-1970，德國醫生和性學家。

### 第一章

- 1 新斯德丁：Neustertin，現今波蘭境內的什切齊內克(Szczecinek, Poland)。
- 2 伯恩斯坦：Bernstein an der Warthe，即現今波蘭的佩烏奇采(Pelczyce, Poland)。
- 3 柏林大學：Berlin University 這所大學於一八二九年更名為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Friedrich-Wilhelm University)。一九四九年再度更名為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
- 4 格賴芬貝格：Greifenberg，現今波蘭境內的格雷菲采(Gryfice, Poland)。
- 5 斯德丁：Sterin，現今斯賽新(Szczecin)。

- 6 勒興：Roschen，為愛德華的第一任妻子羅莎·坎托羅維茨（Rosa Kantorowitz）所生，她在結婚後不久即過世。
- 7 德國駐外公使：Resident Minister，是德國負責管理殖民地的外交官員。盧安達（Rwanda）於一八八四年成為德國的殖民地，其控制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轉讓給了比利時，在一九六二年宣布獨立。
- 8 布雷勞：Breslau，即現今波蘭的弗羅茲瓦夫（Wrocław, Poland）。
- 9 最高樞密醫療諮詢委員：Wirkliche geheime Obermedizinalrath，赫希菲爾常以它來戲稱帝國政府親頒的頭銜。這種頭銜（如諮詢委員或樞密諮詢委員）通常是頒給那些在專業領域上有特殊貢獻的人，於是有醫療諮詢委員、法律諮詢委員、經濟諮詢委員等，即便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被打敗而改為共和體制時，這些頒贈慣例依舊存在。
- 10 聖克洛依茲因雷巴托：St. Kreuz im Leberthal，亦即現今法國的聖克魯瓦歐米納（St. Croix-aux-Mines）。
- 11 自然哲學：Naturphilosophie，指的是一種傳承自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傳統的哲學系統。
- 12 男同性戀：uranianism，這個字出自於伯拉圖的《饗宴》（Symposium）。十九世紀的英國也使用這個專有名詞。
- 13 瑟巴斯提安·克奈浦：Sebastian Kneipp，1821-1897，是巴伐利亞的牧師，是自然醫學療法的創始人之一。最為人所知的是他的水療法。他提倡全麥麵包飲食，當他在韋里斯霍芬修道院任職時，開始對當地人提供水療等療法的服務，並很快地遍及王公貴族。
- 14 市政府：現今的舊立厝（Alt-Lietzow）。
- 15 柏林大街一百二十一號：現今的歐托斯赫大道（Otto-Suhr-Allee）九十八號，一棟新建築。
- 16 安居運動：the settlement movement，屬生活改造運動的一部分，旨在幫都會勞動階級規劃並開發舒適的市郊住宅區。
- 17 提圖斯·珍珠：Truus-Perlen，或許是取名自強壯的羅馬皇帝提圖斯。
- 18 《啟蒙》：Aufklärung，指的是性教育的啟蒙。
- 19 研討會在十一月二日發布「巴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後舉辦。
- 20 奧倫堡事件：Eulenburg Affair，1905-1908。
- 21 SA：是德文「Sturmabteilung」的縮寫，亦即所謂的「衝鋒隊」或「突擊隊」，屬於納粹黨的黨軍而非屬國家的正規軍。對自己的同志身分較不隱藏的恩斯特·羅姆於一九三四年在一次政治政變中，因為對希特勒的政治地位產生威脅而遭謀害。
- 22 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1840-1913，創立德國社會民主黨。



- 23 海恩里希·哈特：Julius and Heinrich Hart，德國作家、文學評論家。
- 24 古斯塔夫·藍道爾：Gustav Landauer，猶太思想家。
- 25 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猶太哲學家。
- 26 威爾海姆·博許：Wilhelm Bölsche，1861-1939，德國作家。
- 27 艾爾瑟·拉斯克·許勒：Else Lasker-Schüler，1869-1945，德國猶太詩人。
- 28 約翰·約阿希姆·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考古與藝術家。
- 29 卡爾·海恩里希·烏爾利希斯：Karl-Heinrich Ulrichs，1825-1895，法律工作者、主張同性戀除罪化。

30 菲利普·歐伊倫堡伯爵：菲利普·弗里德里希·亞歷山大(Philip Friedrich Alexander, 1847-1921)，是歐伊倫堡及赫爾特菲爾德(Herfeld)的王子，在德國服完他的義務役後，在作曲和寫作之餘還從事政治與外交工作。他的家庭屬舊普魯士的貴族，曾服侍過霍恩索倫家族(Hohenzollerns，當代的德意志帝國家族)。他同時是一位法學博士，並在法普戰爭(1870-1871)中獲頒鐵十字勳章，這場戰爭締造了普魯士人所統治的德意志帝國。他曾代表普魯士前往德國境內的其他公國和王國從事外交，一八九三年他奉派前往鄰近奧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至此達到事業的高峰，他在那裡停留至一九〇二年。他是皇帝威廉

二世(Kaiser Wilhelm II, 1859-1941)的親密朋友。一八七五年，他迎娶了一位瑞典貴族並且生了八個小孩。據稱他還和皇帝的內圈成員有過同性間的性接觸，其中包括柏林軍事指揮官庫諾·馮·毛奇伯爵在內，當馬克思·哈爾登(Max Harden)在親社會民主黨的刊物《未來》(Die Zukunft)上揭露這個消息之後，他便在一九〇七年被迫辭職。皇帝內圈存在著同性戀情事時有耳聞，但哈爾登按兵不動，於一九〇二年先是威脅歐伊倫堡要將他收集到的證據曝光。就在軍隊(包括普英部隊)中興起了一陣對士兵和軍官的整肅風及其伴隨而來的自殺潮之後，醜聞就隨著報刊的揭露而爆發開來，也因此帶來了一系列的審判。在一八七一年德國統一後所訂定的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款中，明文規定同性戀行為是違法的。此款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第一百七十五條，是根據較早已經在部分區域實施過的一些法律訂定出來的。《自主》(Der Eigene)雜誌的同性戀發行人阿道夫·布朗德就曾遭當時的首相比洛王子(Prince von Bülow)控訴涉嫌誹謗，他僅承認他聽聞過關於歐伊倫堡的一些故事。歐伊倫堡誓死否認這些故事的真實性並因而被以偽證罪起訴。但他的一些審判卻以健康情況不佳為由而延後了。赫希菲爾德曾在涉及哈爾登與馮·毛奇之間的審判過程中提出證據，但卻在後來的審判被迫修正了他的證詞。赫希菲爾德的專家聲譽也因這一次的撤回再修正而受到傷害，哈爾登為他所引起的這件醜聞深感遺憾，從此以後皇

帝威廉二世身邊沒有了往日的親信，他變得更加窮兵黷武。

- 31 卡爾·亞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精神分裂學家。
- 32 四場大規模會議：哥本哈根／一九二八年，倫敦／一九二九年，維也納／一九三〇年，布爾諾和布律恩／一九三二年。
- 33 弗里德里希·威爾特海姆：Friedrich Wertheim，皮膚學家。
- 34 奧古斯特·貝頌格：August Bessunger，1889-1943/44，放射學家。
- 35 歐伊根·里洵爾：Eugen Litraur，耳鼻喉科。
- 36 漢斯·格拉茲：Hans Graaz，1879-1953，自然療法。
- 37 法蘭茲·普朗格：Franz Prange，1898-1969，內分泌學家。
- 38 約翰內斯／漢斯·克萊斯邁亞：Johannes/Hans, Kreiselmair，1892-1944，婦科學家。
- 39 貝恩特·戈茲：Berndt Götz，1891，精神病學家。
- 40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
- 41 克里斯多夫·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1907-1986，小說家。
- 42 培塔·馬丁·藍貝爾：Peter Martin Lampel，1894-1965。
- 43 路德維希·雷恩：Ludwig Renn，1889-1979。
- 44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
- 45 尼塔·貝爾芭：Anita Berber，1899-1928。
- 46 第爾·布魯格曼：Til Brugman，1888-1958。
- 47 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1869-1951。
- 48 雷奈·克雷維：René Crevel，1900-1935。
- 49 威斯坦·休·奧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
- 50 泡爾·克朗茨：Paul Kranz，筆名恩斯特·耶里希·諾特(Ernst Erich Noth)，1909-1983。
- 51 克里斯其安·夏德：Christian Schad，1894-1983。
- 52 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1898-1948。
- 53 伊沃·蒙塔古：Ivor Montagu，1904-1984。
- 54 西婭·施特恩海姆：Thea Sternheim，1883-1971。
- 55 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
- 56 喬治·西爾維斯特·維埃瑞克：George Sylvester Viereck，1884-1962。於一八八四年生於慕尼黑，母親是美國人，而父親則是著名的社會民主黨政治人物路易斯·維埃瑞克(Louis Viereck)。他的父親於一八九六年移民美國，喬治在一八九七年隨後前往。十年不到，他

便在一九〇四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並於一九〇六年畢業於紐約市立學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在紐約墨非雅德公司（New York: Moffat, Yard and Company）一九〇七年出版的詩選集《尼尼微與其他詩選》（*Nineveh and Other Poems*）中，他以古典詞藻描繪同性戀情事一時蔚為風潮。一本吸血鬼的小說也在同年出版。一九一〇年，另一本由莫非雅德公司出版發行的暢銷書《一位巴伐利亞人的自白》（*Confession of a Barbarian*）不僅詳細敘述了他遍遊歐洲的經過，也為美國人詮釋了歐洲的文化，他因此成為全國知名的人物。他已婚，育有一子彼得·維埃瑞克（Peter Viereck）。他對德國很感興趣，並贊同德國引發兩次世界大戰所持的理由。維埃瑞克曾以記者的身分訪問過許多名人，其中包括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一九二三年，他訪問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並於一九三三年再度與其會面。維埃瑞克是有名的美國納粹人士，曾因身為納粹代理而沒向美國政府報備，於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七年間入監服刑。他在明尼蘇達州的羅賓斯德爾佛賽特出版公司（Robbinsdale, MN: Fawcett Publications）於一九五二年出版的入監回憶錄《男群獸》（*Men into Beasts*）中，詳述了受環境所逼的男同性戀和男性之間的強姦情節，也因此確立了新的「男同志庸俗小說」（gay pulp fiction）類型。維埃瑞克於一九六二年在麻薩諸塞州過世。

- 57 瑪琳巴德：Marienbad，現在的捷克瑪麗亞溫泉市（Mariánské Lázně）。
- 58 金斯貝爾格司（Ginsbergs），哈森克累弗（Hasenclever），戈登（Gordon）等人。

### 第二章

- 1 性的中間性學說：the doctrine of sexual intermediacy。
- 2 法蘭茲·路德維格·馮·諾伊鮑爾：Franz Ludwig von Neugebauer，1856-1914。

### 第三章

- 1 魯道夫·克林瑪：Rudolf Kimmner，1905-1977。
- 2 《同性戀——生物與社會學的當代課題》：Die Homosexualität als biologisch-soziologische Zeitfrage。
- 3 維爾納·萊布蘭德：Werner Leibbrand，1896-1974。
- 4 安娜瑪麗·萊布蘭德-偉特蕾：Annemarie Leibbrand-Wertley，1913-1996。
- 5 《世界大戰之性史》：Sittengeschichte des Weltkriegs，紐約，1934。
- 6 《性異常與性變態》：Sexual Anomalies and Perversions，倫敦，1936。

## 後記

1 班·林賽·Ben B. Lindsey, 1869-1943, 是科羅拉多州的法官, 他和美國聖公會 (Episcopal Church USA) 紐約教區主教威廉·曼寧神父 (Reverend William T. Manning) 在赫希菲爾德拜訪紐約期間, 雙雙捲入一場公共議題的爭論。眾所皆知, 林賽倡導「試婚」(companionate marriage), 允許年輕人在雙方同意不生小孩的條件下, 結婚之前先行同居以決定是否彼此合適。曼寧則譴責這種想法等同於准許婚前性行為。於是林賽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做出了反擊, 他跑到曼寧在晨邊高地聖約翰教堂 (Cathedral of Saint John the Divine in Morningside Heights) 主持的一場布道大會中騷擾儀式的進行, 並要求給予機會反駁曼寧的一些指控。林賽也因此被控妨害社會秩序而遭逮捕。

2 大使館劇院: the Embassy Theatre, 位於百老匯1560號, 就在在時代廣場的西四十六街和四十七街之間, 是羅斯公司 (Loews, Inc.) 於一九二五年專為上流社會開設的電影院。在女繼承人葛洛麗雅·古爾德 (Gloria Gould) 擔任經理的期間, 戲院很不尋常地幾乎全交由女性員工管理。它於一九二九年賣給了蓋爾德企業 (Guild Enterprises)。於同年十月一日開始採取全新聞影片放映計畫, 這項安排一直持續到一九四〇年代末。

3 金養性、性別與生殖研究中心: the Kinse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ex, Gender, and Reproduction。

近代思想圖書館 ⑤⑩

彩虹力量覺醒——同志解放運動第一人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傳

Magnus Hirschfeld: The Origins of the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作者——拉夫·杜斯 (Ralf Dose)

譯者——陳品秀

主編——林芳如

編輯——謝翠鈺

企劃——林倩聿

美術設計——賴佳韋

內頁排版——宸遠彩藝

董事長——趙政岷

總經理——趙政岷

總編輯——余宜芳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三三一七〇五

(〇二)二三〇四七一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〇二)二三〇四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臺北郵政七九一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定價——新台幣二二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彩虹力量覺醒——同志解放運動第一人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傳 / 拉夫·杜斯作；陳品秀譯。--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2014.12  
面；公分。-- (近代思想圖書館；50)  
譯自：Magnus Hirschfeld: the origins of the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ISBN 978-957-13-6131-4(平裝)

1. 赫希菲爾德 (Hirschfeld, Magnus, 1868-1935) 2. 同性戀  
3. 人權運動 4. 歷史 5. 傳記

544.75

103022885

Magnus Hirschfeld: the Origins of the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Copyright © 2005 Verlag HENTRICH & HENTRICH  
Right Arranged by Peony Literary Agency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6131-4  
Printed in Taiwan